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简明读本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简明读本》
编委会

编 审：赵万磊

编 辑：张林洁 林依俐 王志愿

配 图：周国林

编辑说明

为纪念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80 周年，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编辑出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简明读本》一书，旨在回顾“省一大”召开背景，总结“省一大”历史经验，让全市党员干部在重温“省一大”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进动力。全书共计 12 万字，包括图片、综述、回忆文章、文献资料、“省一大”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成员名单和代表简介、省委组织沿革表六部分，以期能够全面地展现“省一大”召开前后的历史概况。

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为了把握现在、开创未来。80 年前，革命先辈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复兴，守初心、担使命，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敢于担当、勇于牺牲。今天，在这新的伟大时代，我们更应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恪守忠诚之心、律己之心、为民之心、奋斗之心，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切实扛起新时代的历史重任，汇聚起推进温州新发展的磅礴力量。

本书的编辑出版是结合纪念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80 周年，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进行的一次学习探索，希望能够引领温州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续写好新时代温州创新史。

编 者

2019 年 7 月



1938年5月7日，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在平阳凤卧玉青岩成立。9月，转为正式省委。图为临时省委成立旧址



1939年3月17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浙江视察，对浙江党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4月16日，省委在温州城区仓坦地下交通站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刘英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并着重研究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问题。左图为周恩来在浙期间留影，下图为仓坦地下交通站旧址





为开好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39年6月中下旬，刘英在平阳凤卧玉青岩主持召开“省一大”预备会议。图为预备会议旧址



1939年7月21日，“省一大”在平阳凤卧冠尖隆重开幕。图为冠尖会场旧址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省委机关代表：刘 英 薛尚实 汪光煊 吴 毓 丁魁梅
浙 南 代 表：龙 跃 郑海嘯 林辉山 陈 平 孙经遂 刘发溪 孙绍奎
宁 绍 代 表：杨思一 王文洋 谢廷斋 魏文彦
台 属 代 表：郑丹甫 周义群 林 尧
金 衢 代 表：林一心 王明扬 何 霖
处 属 代 表：张麒麟 周 源 傅振军
浙 西 代 表：顾玉良

参加“省一大”的代表名单



“省一大”开幕式场景



为确保安全，会议中途转移至平阳凤卧马头岗进行。图为马头岗会场旧址



“省一大”选举场景



“省一大”代表冠尖驻地旧址



“省一大”代表马头岗驻地旧址

省一大选举产生的浙江省委和七大代表

浙江省委：

书 记：刘 英

常 委：汪光煊 薛尚实

委 员：龙 跃（后增补为常委） 张麒麟 郑丹甫 林辉山 刘清扬 顾玉良

候补委员：杨思一 林一心

七大正式代表：

刘 英 汪光煊 龙 跃 顾玉良 张麒麟 郑丹甫 林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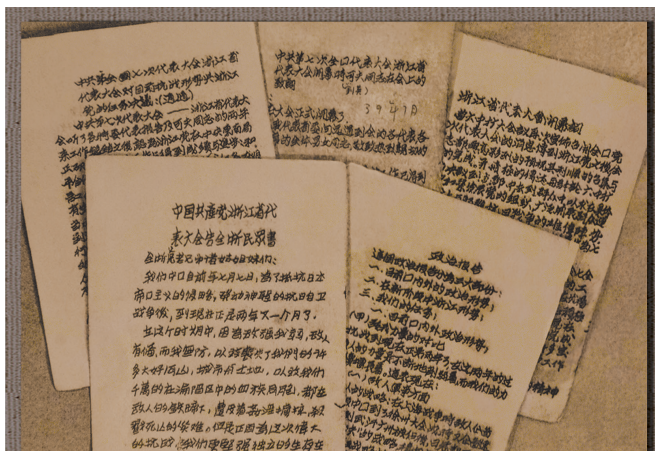
杨思一 丁魁梅 林辉山 孙绍奎 刘发美

七大候补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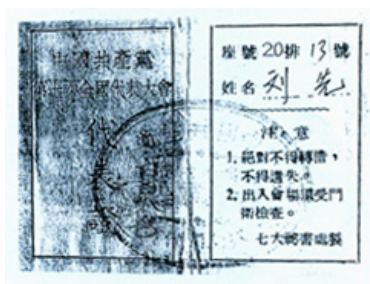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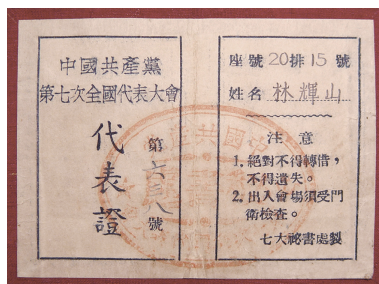
林 尧 谢廷斋等3人

注：因时局紧张，实际浙江省参加七大的代表为5人，名下加线

“省一大”选举产生的浙江省委和七大代表



“省一大”通过的部分文件



“省一大”代表林辉山、刘先（刘发美）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证



抗战前期中共浙江省委秘密联络点——温州小南门三兴、裕丰商店



中共浙江省委秘密机关旧址（1939—1941）——丽水兴华广货号



中共浙江省委在温州的秘密联络点——恒丰盐店。1942年2月8日，刘英在此被捕，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耸立于平阳凤卧马头岗的“省一大”纪念碑



位于平阳凤卧冠尖的“省一大”陈列馆

目 录

■ 综 述

历史的丰碑

——纪念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80周年·····	1
-----------------------------	---

■ 回忆文章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龙 跃	15
抗日救亡的号角 浙江党史的丰碑 ·····	林一心 谢廷斋	26
随刘英赴皖南·····	谢廷斋	35
从冠尖山到宝塔山·····	林一心 刘 先 谢廷斋	44
参加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一些回忆·····	邢子陶	52
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二三事·····	郑嘉顺	54
关于省第一次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的几件事 ·····	郑海啸	58
省第一次党代会的保卫工作·····	廖义融	62

■ 文献资料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	69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72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75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78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党的建设问题》·····	91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108

■ “省一大”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成员名单和代表简介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成员名单·····	113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出席中共七大 的代表名单·····	114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115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席人员名单·····	116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名单·····	117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简介·····	118

■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省委组织沿革表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省委组织沿革表·····	147
-----------------------	-----

综 述

中共浙江省一大纪念馆

浙江

浙江

历史的丰碑

——纪念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80 周年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中国革命红船从这里起航。浙江党组织自成立之日起，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书写了一幕幕绚丽夺目的历史篇章。中共浙江省一大的召开，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浙江党的历史上铸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南平阳召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大会全面总结了中共浙江省委重建以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任务和党的工作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出席党的七大代表。此次大会是浙江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一、中共浙江省一大的筹备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2年9月，浙江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此后全省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组织。在此基础上，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系浙江最早建立的省

委组织，全省党的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省委机关屡遭破坏。1929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浙江的形势，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建立直属中央领导的6个中心县（市）委。省委撤销后，实际上先后建立了杭州、宁波、永嘉、台州、湖州、兰溪、永康、建德、东阳9个中心县（市）委，但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转战于闽浙边，开辟创建游击根据地；11月，在泰顺白柯湾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浙江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却依然薄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在温和谈成功，开辟了浙江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力推动下，浙江其他地区党组织也纷纷建立。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次年2月改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到平阳山门传达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根据指示，1938年5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委同时撤销，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在平阳凤卧乡玉青岩村成立，统一领导全省党组织；同年9月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任书记。省委重建后，根据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浙江党组织发展成为在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坚力量。至中共浙江省一大召开前夕，全省共建立了6个特委和55个县委（县工委），普遍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党员发展到近2万人。与此同时，浙江从抗战第一阶段的辅

助地位转向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地位，成为东南抗战的重要支点之一。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初步分配各地代表名额并明确提出：代表的产生须尽可能做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各地代表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

从1939年初开始，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筹备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2月1日，浙江省委作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号召浙江全党同志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准备工作，加紧进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与选举工作，并要求立即进行按级选举代表的工作。《决议》提出，各县委、特委都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县党代会选举产生参加特区党代会代表，再由特区党代会选举出参加全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3月至4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视察浙江抗战工作，并代表党中央检查和指导浙江党的工作。4月5日，周恩来在金华召集浙江省委领导成员秘密开会，对浙江党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4月16日，省委在温州城区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传达周恩来的重要指示，并着重研究了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在各特委召开党代会、选出参加全省党代会代表的基础上，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

根据省委的决议和指示精神，全省各级党组织在4月至6月间普遍开展了拥护党中央召开七大的宣传活动。4月，各县党组织

先后召开县党代表大会，总结本县党的各项工作，选出参加本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5月，宁绍特委、金衢特委、浙南特委、处属特委、台属特委相继召开地区党代表大会，选举出席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此基础上，浙江省委决定全省党代表大会于7月下旬在浙南基本地区平阳凤卧召开，并提出此次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目的和主要任务：用马列主义总结自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以来一年多的工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克服党内存在的弱点与缺点，发扬优点；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浙江实际情形，具体讨论和决定今后浙江党的任务和总方针；检讨浙江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加强国共亲密合作，团结各抗日党派，动员全浙江人民参加抗战工作；民主选举新的省委领导机构；选举浙江省出席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南平阳召开，是省委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决定。浙南地区是党活动的基本地区，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坚强堡垒。平阳号称“浙江延安”，是党在浙南地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平阳基本地区的党组织与群众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考验，不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坚实的政治基础，还有着良好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和统战工作。而凤卧乡位于平阳县北部山区，离平阳县城30公里左右，是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比较隐蔽的革命老区。在这里举行省党代会，既可掌握周围城镇的敌顽动态，又可对外封锁消息、保守秘密，因而比较安全可靠。

为做好大会的准备工作，省委领导和大会秘书处人员提前

到达平阳。省委在凤卧乡玉青岩村召开省党代会预备会议，为省第一次党代会作充分准备。会议所有文件都由省委领导亲自起草，并经集体讨论、修改、通过。会议政治报告由省委书记刘英亲自起草，其他专门报告文件由省委其他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负责起草。文件定稿后，刘英亲自督促指导文件的翻印工作，编印成《大会特刊》分发给与会代表，以便大会精神更好地传达贯彻落实到各地。

二、中共浙江省一大的召开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凤卧乡冠尖和马头岗召开。大会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刘英作政治报告和一次大会发言在冠尖举行，小组会、两次大会发言及大会选举在马头岗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6名，其中省委机关代表5名：刘英、薛尚实、汪光焕、吴毓、丁魁梅；浙南特委代表7名：龙跃、林辉山、郑海啸、陈平、孙经邃、孙绍奎、刘发羨；宁绍特委代表4名：杨思一、王文祥、谢廷斋、魏文彦；台属特委代表3名：郑丹甫、周义群、林尧；金衢特委代表3名：林一心、王明扬、何霖；处属特委代表3名：张麒麟、周源、傅振军；浙西特委代表1名：顾玉良。同时，省委机关和浙南干部程为昭、胡景斌、陈碧如、陈辉、杨雅欣、郑竞成、郭道款、郑贤塘等列席大会。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浙南老党员叶廷鹏应邀列席，并在大会上作发言。参加闭幕式的人则更多，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以及所在地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也都参加了会议。

大会开幕时，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项英、曾山等为大会名誉主席；一致选举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麒麟、林一心、顾玉良、杨思一、郑丹甫、林辉山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会上，省委书记刘英代表省委致开幕词，并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书面总结。浙南特委、处属特委、台属特委、宁绍特委代表也在大会上作工作汇报。大会通过刘英所作政治报告、工作总结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国际国内形势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统一战线问题》《职工问题》《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提纲》《对青年群众团体的领导问题》《妇女工作问题》《告全浙民众书》等一系列文件。

大会充分肯定了两年来浙江党的工作：浙江党组织在中共中央东南局正确领导之下，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进步。和平合作之前，坚持中央所给予的伟大任务，在艰苦工作中得到闽浙民众的爱护，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建立了东南抗战的重要支点之一。当中央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传达到浙江之后，能缜密而正确地与当局进行谈判并得以胜利完成，同时推动会合各地组织力量，扩大和巩固了党的组织，动员民众参加一切抗战工作，与国民党、各抗日党派及各阶层人民一致为保卫浙江而努力。

大会客观分析了当前正在急剧变化的浙江局势，指出：目前浙江政治形势的特点，将由抗战第一阶段的辅助地位转向抗战相持阶段的主要地位。根据党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巩固

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浙江目前形势，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浙江全党和全省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第一，加紧全民动员，武装保卫沿海，保卫浙江，打退敌人的进攻；第二，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克服摩擦，以推进国共两党更亲密的合作与全民族的更加团结；第三，加紧国民精神总动员，提高民族意识与战斗意志，克服悲观动摇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企图；第四，争取省县参议会的民主，促进保民大会乡镇代表会的实施，以推进民主政治；第五，实施对敌经济封锁，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第六，为增加战时生产，适当改良民众生活，切实救济难民饥民与失学失业青年；第七，动员与组织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民众运动，以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为完成上述战斗任务，大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加倍的努力，发扬艰苦卓绝的作风，提高独立工作的能力，拿出立刻上火线的战斗精神，去执行大会一切的决议”！

大会通过的《告全浙民众书》呼吁：“要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性命与财产，保卫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女不受敌军的奸淫掳掠与残杀，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阻止敌人的进攻，并把野兽样凶残暴虐的敌军赶出中国去。”号召“全浙江民众，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们，应该更加亲密的团结起来，大家齐心一致向着凶顽的敌人瞄准、搏斗！打退沿海沿江敌人的进攻，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薛尚实、汪光焕，委员龙跃（后增补为常委）、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候补委员杨思一、林一

心。薛尚实任组织部部长，汪光焕任宣传部部长，刘英兼任统战部部长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吴毓任统战部副部长，郑嘉治为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陈雨笠为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

大会还选出浙江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其中刘英、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林一心、杨思一、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羨12人为正式代表，林尧、谢廷斋等3人为候补代表。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7月30日胜利闭幕。闭幕式上，刘英致闭幕词，要求代表团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完全反映浙江党整个工作情形，协助七大成功召开，并带回宝贵的指示和决定的任务；要求全体代表把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完满地传达到各地党组织去，深入到支部中去、群众中去，使大会的决议成为全浙江党一致拥护和一致执行的行动方针，成为保卫浙江、争取民族解放的迫切实现的任务；要求新的省委在中央东南局的正确领导之下为彻底完成这次大会决议而奋斗。

中共浙南特委、平阳县委以及当地群众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加强交通联络工作。调整健全交通联络站，选拔政治绝对可靠的工作人员负责接送代表安全到达和离开。所有信件亦交由交通联络站进行转送，不得直接送到会场。二是加强情报工作。在会场周围数十里范围内主要街镇设立情报站，密切监视会场周边国民党军警及顽固分子动态，一旦对方有异动便及时传递情报。情报传递方式也作了明确规定：白天以烟、晚上以光为信号。同时还充分发动群众，加强与统战对象联系。三是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准备凤卧的冠尖和马头岗作为会议场所，以备

遇到紧急状况随时转移。省委和特委机关警卫班临时组建一支武装队伍共3个保卫工作组，一个组负责会场警卫工作，另两个组在当地干部配合下分别对国民党驻军较多的据点进行警戒。同时充分发动当地党支部人员，配合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四是加强信息保密工作。对大会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干部、党员和基本群众进行保密和提高警惕教育，严防敌人渗透、信息泄露。五是加强后勤保障工作。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千方百计做好与会人员饮食、住宿等的安排工作，通过当地党支部分头秘密采购粮食、蔬菜等后勤物资，当地群众也积极捐献蔬菜粮食，慰劳革命干部。这些工作，浙南特委和平阳县负责人反复检查、逐一落实，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圆满成功。

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闭幕后，各级党组织及时传达、学习和贯彻大会的各项决议精神，对党员进行一次普遍的组织观念和党性教育活动。然而，随后不久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浙江各级党组织转入隐蔽斗争，因此省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大部分决议和措施未能真正落地实施。

省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省委常委会考虑到主要干部都去延安势必会影响浙江工作，决定汪光焕、龙跃、顾玉良留下，丁魁梅因怀孕不便前往，由候补代表谢廷斋参加。1939年10月17日，刘英等9名代表从丽水出发去中央东南局集中。代表团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后接中共中央来电，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局逆转，刘英不能离开浙江。根据中央指示，刘英带领杨思一、张麒麟、郑丹甫3名特委书记返回浙江；其余代表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美、谢廷斋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率领前往延安。

他们跋山涉水、历经艰辛、辗转经年，穿越日伪多道封锁，于1940年12月16日到达延安，并代表浙江参加了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赋予的光荣使命。

三、中共浙江省一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选举党的七大代表的需要，是浙江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需要，也是浙江国共合作新局面的需要，对于统一和加强浙江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坚持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共浙江省一大的召开，是浙江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开启了浙江历史新的一页。

（一）统一和加强了浙江地区党的领导

大会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一关键，选举产生新的省委机构，自上而下巩固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统一和加强了党的领导，进一步增强了浙江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进一步统一了浙江地区党和人民的思想和认识，为领导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坚持革命、抗日救亡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委，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高举抗日爱国旗帜，积极领导浙江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越功勋。

（二）阐述和指明了浙江革命方向路径

大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浙江政治形势，认真总结浙江党近两年来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确定了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浙江党下一步的战斗任

务和工作方针，指明了浙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路径，鼓舞了全省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抗日救亡、驱除鞑虏的革命热情，把浙江党争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推向了前进。

（三）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会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结检讨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和问题，提出国共合作、克服摩擦、坚持作战、团结抗日，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和各阶层广大群众，动员全浙人民行动起来一致抗日，促进全民族更加团结，发展和壮大了浙江地区抗日力量，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征程。

■ 回忆文章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龙 跃

1939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浙南代表团团长，也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这次省党代表大会召开的目的是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新的省委委员；总结抗战以来浙江党的工作并确定今后全省党的任务。

浙江临时省委是1938年5月经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决定，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基础上成立的。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临时省委转为浙江省委。在浙江省委成立之前，1937年冬至1938年春，浙江党的组织有好几个系统：首先是闽浙边临时省委所领导的党组织，规模最大，党员人数最多，而且拥有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其次是以徐洁身、邢子陶为主的浙江临委和以顾玉良为主的浙江工委；还有由上海回乡工作的党员所组织的回乡工作团；此外，同济大学的党支部也单独在金华、丽水活动过一段时间。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之后，这几方面的力量都在省委领导之下统一起来了。

浙江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是1938年5月7日在平阳县北港区凤卧乡玉青岩村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委员有刘英、顾玉良、汪光

焕、龙跃和林辉山共5人。谢文清和陈昌会两位委员未曾赶上，没有参加，会议精神是过后几天我向他们传达的。会上确定了委员的分工，除书记经长江局和东南分局指定为刘英外，组织部部长谢文清，宣传部长汪光焕，统战部长刘英兼，青年部长龙跃，后为赖大超。全省成立5个特委和1个中心县委，即：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台属特委（书记宿士平，后为郑丹甫），宁绍特委（书记顾玉良，后为杨思一），金衢特委（书记汪光焕，后为林一心），温州中心县委（书记黄先河，该中心县委于1938年10月撤销）。稍后又成立了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浙西是抗日前线，又与苏皖接壤，浙西特委归东南分局和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东南分局领导为主。1938年9月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时，省委委员又增加了赖大超，他是早些时候由东南分局派来担任省委青年部长的。

浙江省委成立后，省委机关于1938年5月12日由浙南游击区迁入温州，依靠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为掩护，领导全省工作。1938年10月10日新四军驻温通讯处被国民党温台防守司令部^[1]查封后，省委机关转入地下秘密活动。1939年2、3月间，省委由温州秘密迁往丽水，在那里一直活动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才又搬回温州。

抗战初期，浙江的形势很好，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党的组织也发展很快。浙江形势好的原因，一是党在浙江有基础，主要是浙江南部有两块革命根据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后，党在浙南城乡取得公开

[1] 应为国民党温台戒严司令部。

合法和半公开合法的地位；后来，新四军又在浙江建立了公开机构。因此我党我军在浙江各界人民中影响很大，威信很高。二是浙江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主要又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历来受革命的影响较深，政治觉悟也较高。上海、南京和杭州相继沦陷后，浙江处于日寇侵略的直接威胁之下，朝不保夕，因此，抗日救亡，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成了浙江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和行动。三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和上海地下党派遣和介绍了一大批党员干部来浙江或回浙江工作；同时上海、杭州一批大专院校内迁时，也留下了少数党员和一批党外的积极分子在浙江工作。所以，当时浙江党内的干部比较多，而且分布在全省各地和各个方面，起了领导核心作用。四是京、沪、杭陷落后，一批工人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上海、无锡、杭州、嘉兴等地辗转来到富春江以南以及金华、丽水等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党，成了党的干部。五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带了一批桂系骨干来到浙江，自称“学习第二战区阎锡山和共产党协作抗日的经验”，公布了一批比较进步的法令和建立了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等，这些，也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我党工作的开展。

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浙江有55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没有建立县委和工委的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在那里起作用，全省发展党员达2万余人。

在群众运动方面，工、农、青、妇和文化教育界都相当普遍地建立了各自的救亡团体。1938年1月初，兰溪县我党党员邵

惠群上书黄绍竑，建议他发动民众抗日救亡，在兰溪建立政治工作队，归县长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形势、组织各种社团、发动抗日救亡运动。黄绍竑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月下旬亲自到兰溪参加了兰溪县政工队的成立大会，产生了浙江省的第一个政工队。然后，黄绍竑又下令推广。因此全省各县都建立了政工队。我们派遣了一批党员加入政工队，并动员了大批优秀知识青年参加进去，因此，大部分政工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里。黄绍竑公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也比较进步，其中有“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澄清吏治，铲除贪污”以及“减轻地租，改善贫民生活”等内容。这样，我们搞公开斗争就有了合法的依据。还有各县的民众教育馆，也是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阵地。我们利用这些合法组织，深入农村，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等，领导农民推行“二五”减租，开展反对贪官污吏和改选乡、保、甲长等的斗争，打击了农村中的封建势力。

统一战线工作，也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主要是与黄绍竑合作得比较好。黄绍竑1937年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对日作战，受到我党和八路军的影响，表现比较进步。但他主要的是想利用全民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机会，在浙江发展他自己的势力，他带来的广西骨干中有些人也比较进步，以后又用了一些浙江当地的开明人士。我们的统战工作，首先就是争取这些人。我们用各种方式同他们合作，有的由省委指派专人跟他们联系，更主要的是派遣党员到他们那里去工作，通过党员的作用，和他们建立统战关系，以便打开工作局面。据我所知，抗战初期浙江统战工作

搞得最好的，是国民党省政府的建设厅系统和丽水地区。那时丽水是浙江的抗战后方，国民党省政府许多机关都搬在丽水城区及其附近的碧湖、大港头等地。建设厅也在丽水，其下设有物产调整处与木炭、桐油、茶叶等贸易公司。建设厅长伍廷飏是黄绍竑的得力骨干，他容纳了一批共产党员如张锡昌、骆耕漠、曾涛、陈虞荪、汪海粟等在物产调整处工作。还有一批党员担任了乡村建设指导员，分配在丽水地区各县工作。1938年黄绍竑将龙泉、云和、遂昌三县作为经济建设实验区，委派三位进步人士去当县长（龙泉为唐巽泽，云和为潘一尘，遂昌为陈希澄），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县、区政府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如龙泉县教育科长邵荃麟、政训室主任张三扬，编审室主任葛琴（他们三人于1938年冬离开），民教馆长舒文，民众剧场主任王灿，政工队正、副队长俞坚和杜大公等，都是共产党员。云和与遂昌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在县、区、乡担任公开工作，如现在华东师大的施平和国务院国防工办计划局的陈平，就在云和县政府担任过科长和技士。当时这三县的工作搞得很活跃。1939年10月黄绍竑又委托进步人士余森文担任丽水专员。余森文间接或直接掩护过我们党的活动。可惜当时我们还缺乏经验，党的活动过于突出，引起了CC派人物的注目，他们把物产调整处称为“共产调整处”，说龙泉县成了“苏区”。后来环境逆转，上面这些同志只好转移了。其他地区的统战工作也搞得不错，以金华地区的义乌县为例，1938年上半年，义乌县由当地我党有威望的老党员吴璋出来组织了县政工队，安排了一批党员在政工队工作，完全掌握了政工队的领导权。1938年末，黄绍竑指

派当地知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吴山民担任义乌县县长，对我们也很有利。吴山民是吴璋的知交，他向吴璋请教，要求吴璋替他出主意，解决干部问题。吴山民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不加歧视，不强迫他们加入国民党。因此，我党派了一批干部帮助他上任。如县政府秘书、军事科长、兵役科长、自卫中队长、分队长和指导员都是我党党员。县政府的工作，凡比较重要的，吴山民都和我党党员吴璋、华延陵商量决定。他们三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共合作的领导核心。因此，人们称义乌县政府为“统一战线政权”。1942年日军侵占浙赣铁路后，义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吴山民也参加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开展，在文化工作方面也打开了局面。从1938年到1940年冬，很多文化教育机关和文化人云集金华，这里成了浙江的文化中心。在金华出版的报刊很多，除国民党主办的《东南日报》《正报》和《大风》周刊外，有不少刊物是由我党领导或在我党的影响下出版的，如：由邵荃麟、葛琴、郑洪范主编，严北溟负责出版的《浙江潮》；由骆耕漠主编的《东南战线》；由涂峰主编的《青年团结》；由贵婉兰负责编辑出版的《浙江妇女》；由陈怀白、杭苇负责出版的《浙江儿童》等。1938年上半年，在国内有影响的新知书店桂林总店派党员吴顾琪来浙江，首先在金华开设了新知书店金华分店，接着在丽水、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都开设了分店，出售抗战书报、左翼文艺、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革命书刊。党内文艺界前辈冯雪峰抗战初期也在浙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艺和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根据党中央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通知以及东南局的指示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原来是打算在1940年召开的，所以，浙江省委要在1939年7月选好出席七大的代表。在这以前，大部分特委都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于1939年7月21日至30日在平阳县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召开。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刘英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一次大会发言，是在冠尖进行的；小组会、两次大会发言及选举是在马头岗进行的。出席代表有25名。计省委机关5名：刘英、薛尚实、汪光焕、吴毓、丁魁梅；浙南7名：龙跃、林辉山、郑海啸、陈平、孙经邃、孙绍奎、刘发羨；处属3名：张麒麟、周源、傅振军；台属3名：郑丹甫、周义群、林尧；宁绍3名：杨思一、高子清^[1]、谢廷斋；金衢3名：林一心、王明扬、何霖；浙西1名：顾玉良^[2]。此外，省委机关干部程为昭，浙南干部胡景城、陈碧如、陈辉、杨雅欣、郑竟成、郭道款、郑贤塘等列席了大会。正式代表加列席的共30余人。参加闭幕式的人则更多，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两机关的一些干部以及所在地的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也都参加了。平阳县民运部长^[3]叶廷鹏也参加了闭幕大会，并以来宾身份发表自由演说，讲了1931年他在平阳鳌

[1] 王文祥，原名高子清。

[2] 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应为26名，除回忆中提到的25人外，还有宁绍特委代表魏文彦。

[3] 应为农运部长。

峰小学当炊事员时与改组派作斗争的情形，说得慷慨激昂。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有刘清扬和邢子陶^[1]。

大会开幕时，一致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项英、曾山等为党代表大会名誉主席。一致选举刘英、薛尚实、汪光煊、龙跃、张麒麟、顾玉良、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林辉山等组成大会主席团。

省委书记刘英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和提交了两年来浙江工作的书面总结。各特区的代表团团长多数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汇报，只有金衢和浙西两个特区因工作保密关系，他们没有在大会上汇报，大会最后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以及《告浙江全省同胞书》^[2]等文件。《目前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犯的形势下，浙江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着，将由抗战第一阶段的辅助地位变为主要地位。因此，对浙江全党和浙江人民提出了七条任务，这就是：

一、加紧全民动员，武装保卫沿海，保卫浙江，打退敌人的进犯；

二、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克服摩擦，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加紧国民精神总动员，提高民族意识与抗战意志，克服悲观动摇，反对投降妥协；

[1] 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除刘清扬、邢子陶外，还有郑嘉顺。

[2] 应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告全浙民众书》。

四、争取省、县参议会，扩大民主，促进基层民主实施，推进民主政治；

五、实施对敌经济封锁，发展自给自足经济；

六、增强战时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救济难民、饥民及失业、失学青年；

七、动员与组织广大工、农、青、妇，发展民众团体，扩大群众运动，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

决议指出：要深入到各县、各区、各产业、各群众团体中去，大量发展党员，吸收产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健全支部生活，加强支部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地方干部、军事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并加强对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提倡党员干部学习军事；要严防汉奸、国民党特务和亲日派混入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政治工作警惕性，正确区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界线并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清洗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出党，以保卫党的纯洁性。此外，小组会上还讨论了几个专门问题，如什么叫“左”、右倾机会主义，如何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什么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界线以及如何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等。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刘英、龙跃、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丁魁梅、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羨等10位同志，谢廷斋为候补代表^[1]。

[1] 选举产生的出席中共七大的浙江正式代表应为12人，除回忆中提到的10人外，还有汪光焕、顾玉良。候补代表应为3人，除谢廷斋外，还有林尧，另1人姓名不详。

大会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等7位同志为省委委员^[1]，杨思一、林一心为省委候补委员。刘英、薛尚实、汪光焕为省委常委。刘英为书记，薛尚实为组织部部长，汪光焕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仍由刘英兼任。1940年冬^[2]，薛尚实调东南局后，他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职务，由龙跃继任。

代表大会闭幕后，省委常委经过酝酿，考虑到主要干部很多都到延安开会去了，怕影响工作，特别是怕影响浙南基本地区的工作，因此决定将龙跃留下，由龙跃配合薛尚实主持和照顾省委与基本地区两方面的工作。丁魁梅因怀孕不能去延安，决定由候补代表谢廷斋补上。代表团在团长刘英的率领下于1939年9月17日^[3]从丽水动身去东南局集中。代表团到了皖南后，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谓时局正在逆转，刘英不能离开浙江。因此，刘英在征得东南局同意后，又与代表团中的3个特委书记：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一起回到浙江。出席七大代表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率领前往延安，同去的代表有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羨和谢廷斋。

1940年形势逆转后，浙江各地一些公开工作、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都陆续向皖南撤退了。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有的特委的机构、辖区作了变动：金衢特委分为金属特委（书记王

[1]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省委委员应为9人，除回忆中提到的7人外，还有刘清扬、顾玉良。

[2] 应为1939年冬。

[3] 应为1939年10月17日。

明扬，后为朱维善^[1]，朱被捕后由陈雨笠代理）和衢属特委（书记张贵卿）；宁绍特委分为宁属特委（书记高子清）和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处属地区的基本地区改为闽浙边委（书记张麒麟，张牺牲后，由宣恩金代理），原所属的丽水中心县委（书记顾春林，1942年2月后为傅振军）归省委直接领导。

1941年4月，浙江省委接到毛主席的电报，谓浙江代表已顺利到达延安，请浙江省委放心。毛主席于1939年电令刘英不要离开浙江；代表团到达延安后，又拍电报来，可见党中央、毛主席对浙江非常重视。代表们在路上走了15个月，也是够辛苦的了。

省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及时地向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了传达，并组织干部学习讨论，贯彻执行。

（节录自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 应为朱惟善。

抗日救亡的号角 浙江党史的丰碑

林一心 谢廷斋

1939年7月在浙南平阳胜利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今已经55周年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往事如碑，历历在目。兹就我们对大会的记忆，扼要写出，以纪念55年前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一、全省党的基本情况和形势特点

抗战两年多来，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切抗日爱国人士的努力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遍及全省城乡的抗日救亡运动。战争教育了人民，战争锻炼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到1939年7月省党代大会开幕时，团结在党周围的、浙江有组织的群众已达几十万人。其中有几万名进步青年是各级各种群众抗日救亡组织的骨干。在这个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浙江党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及时和大量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在省第一次党代大会开幕时，全省已拥有19000多名共产党员；在浙江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已建立起浙南、处属、台属、金衢、宁绍、浙西等6个特委，有50多个县已建立了中共县委会或县工作委员会，没有建立县级领导机构的县份也有党

员、支部或特支。尽管重建后的浙江党组织和极大部分党员都是新的、缺乏政治斗争锻炼的组织和战士，但他们有党的领导和几十万各界群众的密切联系，朝气蓬勃、年轻有为，不计个人得失，富于革命牺牲精神。这是一支浙江党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力量，是浙江当时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倒退的中流砥柱。正因为如此，也就成为浙江顽固派所最害怕、最不愿意见到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抗日、进步力量。

而当时浙江抗战形势的特点是：浙江已成为战争的前线，但敌人暂时还没有大举进攻；政治形势已经开始逆转，但这种逆转还是初期、局部的、渐进的；黄绍竑虽然已逐渐消极、退缩、右转，但当时还有一定的能量与作为。因此，在广大的国统区和敌后方，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还有我们党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空间和机会。这就是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全省党的基本情况和形势特点。

二、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37年12月23日^[1] 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9月开始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了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问题。1939年2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号召浙江全党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准备，做好宣传和选举工作。

应该特别指出：1939年三四月周恩来到浙江前线视察，在

[1] 决议时间应为1937年12月13日。

金华秘密召见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吴毓等省委领导时所作的对全国与浙江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浙江党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是省委进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准备的主要指导思想。当时恩来指示：“目前浙江的政治形势还算好，但也有反共摩擦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浙江党的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也要继续发展，尤其要向空白地区发展，但必须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汉奸和托派分子混入党内”“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干部，特别要培养军事干部，派到沦陷区去工作”“要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干部要埋头苦干，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指示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干部：“不要搞得太红，要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等。这些重要的指示，省委不仅贯彻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各项议程之中，而且及时作出了《关于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各个特委贯彻、落实。

遵照省委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金衢特委所属的金华、兰溪、东阳、义乌等县委均于4月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总结本县党的各项工作，选举出席特区第一次党代表会的代表。在这个基础上金衢特委于5月份在兰溪召开了全特区第一次党代会，参加会议的有林一心、王明扬、朱惟善、吴拯黎、李乐山、马丁、王志远、何霖、江征帆、黄祖明等12人，会议听取了林一心的工作报告，检讨了过去一年多来的工作，研究了当时的形势，确定了今后的任务，选举林一心、王明扬、何霖为出席浙江省第

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中共宁绍特委所属的宁波、慈溪、余姚、诸暨、嵊县等各县委亦均在4月份分别召开了县党代会，总结工作，选出参加宁绍特区党代会的代表。1939年5月，宁绍特区党代会在诸暨县枫桥区安山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杨思一、高子清、魏文彦、王正山、张光、余宗凯、张月珍、金如山、谢廷斋等10余位代表，省委派汪光焕莅会指导，省妇联的程为昭亦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杨思一代表特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工作，确定了今后的任务，选举杨思一、高子清、魏文彦、谢廷斋为出席省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

1939年6月，省委决定省第一次党代会在浙南平阳山区召开。因为这里是刘英、粟裕领导的工农红军坚持闽浙边3年游击战争的基地之一，有革命的传统和坚强的政治基础，党与群众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党群关系血肉相连，亲密无间。这里党组织掌握着一些“白皮红心”的乡镇、保甲政权，党与当地一些上层分子有较好的统战关系。这里既可以掌握周围几个城市的敌、顽动态，又可以对外封锁消息、保守秘密。事实上抗战初期的平阳山区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隐蔽的红色基地，在这里举行省第一次党代会是安全可靠的。以后的历史实际也证明了这点。

三、庄严隆重富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大会

1939年6月底、7月初，金衢、宁绍特委接到了省委关于7月下旬在平阳举行省党代大会的通知，两个特委参加大会的7位代表，分别从各自的地区出发，于7月20日以前赶到省委在温州城内

的秘密联络点。当晚即在温州城里分散隐蔽地住了一宿，翌日黎明前由秘密交通员分别带我们到城边一个小码头，登上两艘小木船，离开温州，经水路向平阳进发，船夫肯定都是自己的同志，但按秘密工作原则无需询问。两船同行，宁绍在前，金衢在后，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船行半日，到了一个镇子附近，遇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巡逻兵，他们吆喝，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到哪里去。命令我们小船靠岸接受检查。在这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头船主动靠岸，谢廷斋即跳上岸去与巡逻兵交涉，原来这是省抗日自卫队的巡逻兵，谢则出示省抗日自卫队第六支队第一总队谍报室（当时在余姚县委控制、掌握下）的“特务证”交验，说明是“奉命”到此地执行特殊任务的，并乘机打听这一带的“敌情”。巡逻兵见是“自己人”，即简要告诉了附近情况后善意放行。谢廷斋道别后回到船上，命船继续前进，后船亦即迅速跟进。一场虚惊平安度过，后来两个特委的同志均很欣赏这个“掩护武器”。当日下午黄昏时分，船抵平阳境内一个小小的码头，我们即弃船上岸，在向导的带领下迅速进入平阳山区，越走天越黑，越是小路崎岖、山峦重叠，我们意识到脚下正是坚持3年浴血奋战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心情都很不平静。快接近目的地，黑暗中几次碰到浙南特委布置的秘密岗哨的盘问，使人感到这里仍保持着严密的红色警戒，到处有保卫革命的“带枪的人”。深夜，我们安全到达临时省委所在地——平阳县凤卧的玉青岩村^[1]。进村，交通员直接领我们到刘英住处（一个群众家里），适汪光焕

[1] 应为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所在地——平阳马头岗村。

也在那里。他们见到我们按时安全到达，都很高兴，交代工作人员为我们迅速安排好住处，准备晚饭，并嘱咐我们要很好休息，以便精力充沛地开好会议。翌日，薛尚实、龙跃也来看望我们。大会秘书处迅即发来有关文件，我们则抓紧时间学习。

7月21日，党代大会正式开幕。我们一进入会场即感到一种隆重热烈的气氛，场内主席台正中悬挂了中共党旗，两边插了红旗，上方是大幅会议横标，四周又是好多锦旗和彩纸标语。会场空间开阔，桌椅整洁，人员来往井然有序。这一切，对我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来说，是很新鲜的。

8时正，大会开始，刘英致开幕词和通过大会议程、通过主席团名单。接着刘英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一年多来浙江党的各项工作，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提出了浙江党今后的主要任务和斗争策略；号召全省共产党员与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省人民组织起来，准备武装斗争，加强国民党地方团队的工作，加强浙西等沦陷区的工作，组织人民参加和扩大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摩擦、倒退；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内阶级教育和革命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和政治警惕性。《报告》号召全浙共产党员团结战斗，克服困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政治报告后，全体代表分组进行讨论，金衢、宁绍两地代表编为一个小组，进行了热烈详尽的讨论，然后宁绍代表组指定

谢廷斋在大会上发言，主要是汇报了宁绍特区群众运动的情况和余姚党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减租退押斗争，领导山民、盐民反对恶霸、反对奸商、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情况。

经过全体代表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目前形势和浙江党的任务》^[1]和有关统一战线工作、职工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等13个文件。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员会成员，选举了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其中包括金衢特委的林一心、宁绍特委的杨思一、谢廷斋（候补）。

大会于7月30日圆满结束，各地代表怀着战斗的激情，秘密地离开平阳，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迅速把大会的决议和精神传达到所属各县党组织，认真进行贯彻。

四、大会以后

1939年8月以后，金衢和宁绍特委根据省党代大会的决议和发展中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沿海、山区、浙赣铁路员工中及其两侧地区的党的发展工作和群众工作，为未来开展对敌游击战争打好党与群众基础，两特委均分别召开了青年活动分子会议和妇女工作会议，以加强当时比较薄弱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全区比较薄弱的妇女工作。

这一时期宁绍特委加强了杭州湾北岸和定海沦陷区建立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加强了对国统区地方部队的工作，通过

[1] 应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

群众团体动员和组织适龄青年志愿参军，在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卫队、土枪队、梭镖队等半武装组织，并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教育。金衢特委加强了国民党地方团队中的统战工作，并在金华、武义等县的地方军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在金华和各地邮电系统中建立党的工作，通过它掌握当时省内的军事、政治、社会情况，也对各地党组织传递有关信息。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两特委均积极开展对中下层统战对象的工作，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贯彻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的统战工作方针。在政治摩擦事件中，努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国民党政权、军队和上层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努力做到：“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埋头工作，长期坚持，争取胜利。

这一时期两特区均加强了党的建设。建立了兰溪、义乌、江山、宁波、余姚、诸暨、嵊县等中心县委，以照顾和加强其附近县份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指导。全区党组织实行以巩固为主，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的方针。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区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禁止做秘密工作的党员进出政府机构和群众团体，做公开工作的党员进出党的秘密机关。切断党组织之间和不属于同一小组的党员之间横的关系，对部分党员实行单线联系。强调党员的社会职业掩护，调动一部分面目较红的干部异地工作，停止了一些动摇分子的组织关系。

总之，在省党代大会以后，我们在省委的领导下在群众运动、武装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党的组织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9年底金衢地区

党员发展到1700多人，宁绍地区的党员发展到2000余人。

1939年10月省委通知各特委出席七大的代表到金华的省委秘密联络点集中，我们奉命按时到达。10月中下旬，在两位新四军干部的掩护下，我们均化装成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由刘英书记亲自率领，从金华出发乘车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即中共中央东南局）报到，以便转赴延安参加七大。我们在军部待命一月有余，到11月底，东南局书记项英向刘英传达了中央的电令，大意是：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内政局恶化，要刘英不去延安，回浙江继续领导浙江党和人民，坚持斗争。刘英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安危，愉快地接受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经与东南局商定，刘英率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等三位特委书记回浙江坚持工作，指定林一心负责率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羨、谢廷斋一行5人去延安参加会议。12月上旬，我们5人在云岭军部同刘英等互道珍重，依依话别。不料这竟成为我们同刘英、张麒麟同志的永别！

1940年1月中旬，我们浙江5位代表与南方8省区地下党组织的代表们一起，从东南局出发，经过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偷越过无数道敌人的封锁线，长途跋涉，于1940年12月16日才安全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又经过4年多在中央党校的学习与等待，于1945年4月至6月代表浙江党参加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浙江省第一次党代大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原载《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随刘英赴皖南

谢廷斋

我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39年7月在浙南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我们宁绍特委以杨思一为首的四位代表，于7月18日（或19日）到达党在温州市内的秘密联络站。翌日黎明，在省委秘密交通的引领下，乘小船离温州，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平阳境内的一个小码头，旋即弃船上岸，迅速进入山区。越前进越是小路崎岖、山峦重叠，边走边使人意识到脚下正是红军坚持三年革命战争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快接近目的地时，黑暗中遇到了浙南特委布置的几层秘密岗哨的盘问，使人感到这里仍保持着严密的警戒。晚上九十点钟，我们安全到达党代大会会场所在地——平阳马头岗村。刘英已经与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先期到达这里。我们进村后，交通员把我们直接领到刘英的住处（一个群众家里）。刘英见到我们按时安全到达，很高兴，握手慰问，交代工作人员迅速为我们准备晚饭和安排住处，嘱咐我们很好休息，以便消除疲劳开好会议。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亲切热情，使人感到接待我们的是同志和战友，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首长。因此，我这个幼稚无知的青年党员一扫习惯的拘谨。

7月21日，党代大会开幕。大会开了20天^[1]。其间，刘英代表主席团致了开幕词，又代表省委作了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总结，主持新省委和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最后致闭幕词，宣告大会胜利结束。在这短短的20天里，他在会上的讲话和举止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

刘英同粟裕一起，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高举红旗，转战闽浙边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七七事变之后，他们又胜利地实现了两个很大的转变，即由十年苏维埃土地革命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红军的武装斗争形式转变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式。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刘英思想敏锐，立场明确，在他的生动、风趣的语言中，充满着斗争的经验、胆识和魄力，使人听了感到振奋。

刘英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同志一道工作。当时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中，有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有长期坚持白区工作的老干部，有闽浙边红军游击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在国民党监狱中长期斗争、抗战后才出狱的共产党员，有工农同志，也有知识分子。刘英把浙江党组织的几个部分和来自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浙江省委，胜利地开展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工作。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刘英很注意革命队伍中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培养。当时在中

[1]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间是1939年7月21日至30日。

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各个特委的领导骨干，其中很多人都是象我这样的“初生牛犊”。刘英热情地关心这一代新人，大胆地信任和使用我们，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战斗。

刘英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他在党和非党群众中威信很高。会议期间常有群众来访，他总是挤出时间与之倾谈。来访群众有的叫他“首长”，有的则叫他“可夫同志”，都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称呼。可见这些群众同他是老关系。

党代大会一结束，我们即告别浙南，回到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宁绍特委，迅速地把大会精神和斗争任务传达、布置到各县党组织。两个月之后，即1939年10月中旬，接省委通知：令杨思一和我立即到省委在金华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集合，将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迅即安排了工作，告别了宁绍特委的同志，化装潜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我们到来之前，刘英已经从丽水赶到这里。这是我第二次和刘英在一起。

我们在金华住了四五天。离开金华之前，为了沿途安全和保密，我们按照省委通知，把原来用作掩护的证件和衣物统统交给省委保管。以刘英为首的九位代表都换上了新四军的军装，准备作为新四军的工作人员，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亦即中共中央东南局机关）报到。出发的前一天，刘英为了了解文化界的情况和安排工作，还挤出时间去看望了当时在金华的邵荃麟和葛琴，他们俩人是作家和文化人的身份在这里坚持党的工作的。当时刘英要我们同他一起去。杨思一和我已经在秘密机关里憋了几几天，也想在离浙之际，看看金华的市容，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因此我们

（还有其他两位同志）欣然与刘英同行。刘英穿的是高级军官料子军服，背三角皮带，系着佩剑（国民党叫“军人魂”），脚蹬黑色皮靴，后跟上还套着铮亮的“马刺”，这一身合体的打扮，使他俨然成了一位威武的高级将领。跟在后面的我们数人，当然就成为军装笔挺、步伐矫健的随员了。原来去邵荃麟住处，必须经过国民党驻军一个司令部，门口站着双岗。当我们随刘英经过这个司令部门口时，哨兵立即向刘英立正、敬礼，刘英很熟练地随手还礼，从容地走过门口。当初刚出门走到街上时，我感到刘英今天有些冒险，或者是大意，怎么自己去看邵荃麟，也邀我们一起走走呢？一群人，目标很大，行动不便。回来时我才明白，原来刘英邀我们同行正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行动。因为既然打扮成一位高级将领，单身在街上走动是不相称的，而后面跟随着一帮随从，才是正常的、适宜的。国民党的特务和大兵们，怎么会知道这就是他们曾经悬赏通缉的共军首领和现在中共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

第二天，刘英率领我们八人（即张麒麟、郑丹甫、杨思一、林一心、林辉山、孙绍奎、刘发羨和我），在两位新四军干部的护送下，离开金华，乘公交汽车奔赴皖南。途中几天的买票、验证、宿店、吃饭，都是新四军的护送干部安排的。三四天后，我们到达军部设在皖南岩寺的兵站，这就等于回到了自己家里，得到了一个整晚安定的休息。兵站站长是认识刘英的，招待十分热情，并立即与军部通话，报告了刘英安全到达的消息。翌日清晨，兵站派专车（军用卡车）送我们继续赶路。出发时，站长亲自告诉司机：“要一路小心，保证安全。”下午，我们顺利到达

了目的地——皖南新四军军部。这是1939年10月底或11月初的事情。

我们住在军部招待所里。那是一幢小小的民房，中间是过堂，两侧是卧室，刘英、杨思一等四人住一室，其余五人住一室。军部总务科通知招待所，我们九人的菜金，每人每天从8分增加到1角8分。这已经是很大的优待了。刘英与我们同吃同住，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如果有的话，就是他的床位靠着窗口，那里光线好一点；窗下有一张小板桌，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和写点东西。我们在军部仍是保密的，招待员不知道我们是谁，只从增加菜金中知道我们是军部首长的客人。

刘英在军部招待所期间，袁国平、周子昆、曾山等领导人曾来这里看望，但是来的次数最多的是项英。项英一来，总是同刘英倾心长谈，有时一坐就是几小时。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我们从不打听他们交谈的内容。项英在谈话中笑声很高，这对于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低声细语的地下工作者来说，很不习惯，所以只要听到对面房间里传出爽朗的笑声，我们就知道项英又来看望刘英了。

根据军部的要求，刘英在这里改定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总结》^[1]一文，交给孙绍奎和我誊抄清楚。我俩每人每天抄写七八千字，足足抄了一个星期。当时曾听说此文将发表在新四军的机关刊物《抗敌》杂志上，不知道后来是否发表了。

我们在军部住了一两周以后，项英亲自出面，袁国平、周子

[1] 应为《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昆等作陪，宴请了刘英和闽浙两省到达军部的七大代表。席间，项英和袁国平讲了话，他们高度评价了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和当前浙江党的工作。袁国平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刘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所属各省的模范省委书记。

又过了一二周，当我们正在期待出发通知的时候，项英向刘英传达了党中央发来的电示，大意是：国内时局恶化，蒋介石加紧反共，刘英应返回浙江，坚持斗争。接着，刘英与项英商定：代表中的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台属特委书记郑丹甫和宁绍特委书记杨思一，随刘英一起回浙江坚持工作；其余五人，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负责，率领林辉山、刘发羨、孙绍奎和我，代表浙江党组织去延安参加七大。不久，我们即从军部获知山西发生晋南事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抄、全国性反共高潮到来的消息。这说明中央作出刘英回浙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最初，中央因为要了解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和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工作，所以指定刘英亲去中央参加会议；现在因时局逆转，为了要坚持浙江斗争，重新决定刘英不去延安，返回浙江。这一来一回，都说明中央对刘英的信任和重托。我们见到刘英对中央的决定愉快地接受，毫无难色，而且立即就地与各特委负责同志研究回浙江后的工作。

当时，刘英曾与项英研究决定：为了应付时局突变，避免损失，把浙江各地面目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撤退到新四军工作。这一决定对保存浙江党的干部，起了良好的作用。

刘英要回去了，我请他给我写几句临别赠言，以留作纪念。刘英在我的《生活日记》扉页上，以刚劲的笔法题写：“廷斋

同志：你是朝气蓬勃、年青有为的共产党员，望你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终身奋斗！”在另一页上，又题写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学习、再学习”。后来，我在这本《生活日记》中，又记上了刘少奇初到华中时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上的报告，题目是《从华中的经验看华中的工作》，还记上了各根据地领导同志给我们所作的报告的记录。后来，在一年的长途行军和四年多的延安学习生活中，这本《生活日记》经过雨淋汗沁，风吹日晒，已是封面剥落，装订松散了，但我始终爱如珍宝，带在身边，直到1945年8月我们离开延安的前几天，才交给了组织。因为当时中央决定我们浙江的5位同志仍回到日寇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闽浙赣边区开辟工作，不宜带着这类东西。

我们在招待所居住期间，军部曾给我们发了新的灰色棉布军大衣，我因已有一件西式呢子大衣，所以未领。刘英要回去了，为了化装，他想用自己的新棉大衣掉换我的旧呢大衣，于是请杨思一征得我的同意。这使我很感动，他为这点区区小事，竟如此公私分明，平等待人。

在最后分别时，刘英还专门把我们几位去延安的同志找来了开了个会，嘱咐我们：要尊重林一心的领导；要做到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团结外省的同志，不要给各省党代表以不良影响；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完成党所赋予的光荣任务。刘英的临别嘱咐，我们5位同志确实是牢记在心头的。在一年多的敌后行军生活中和四年多的中央党校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的；直到七大以后离开延安，奔向敌后，旋又奉命转赴东北，始终如此。应该说，我们5位同志是实践了刘英对我们的嘱咐和教育的。

我记得刘英等是1939年11月底或12月初离开军部的，他们走后不久，我们即从军部搬到当时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居住。1940年1月中，东南局派部队护送我们北上，1月28日晚偷渡长江，然后转入敌后，经过华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12月16日胜利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从1941年1月开始，我们5位同志断断续续地向陈云和中央组织部汇报了浙江党的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我们详细地汇报了浙南、金衢、宁绍三个特委的具体情况，并写了书面报告，也汇报了以刘英为首的浙江省委组成人员情况和其他几个特委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在汇报结束时，陈云向我们指出：“看来浙江党是好的，党的领导掌握在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同志手里。”这就是当时党中央对浙江党组织和刘英的评语。

1941年1月21日和22日，党中央公布了皖南事变的消息。这使我们浸沉在万分焦急和沉痛中，想念军部八省健儿，竟遭此浩劫；也想到其中一定包括着新近从浙江调到军部工作的很多同志。联想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捕杀，必将祸及祖国的东南半壁，坚持家乡白区斗争的同志们，将处在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里。我们曾日夜为刘英等领导同志和战友们的安危担心。但是相隔千山万水，听不到任何具体的消息！

1942年夏天，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作了时事报告，其中讲到：刘英被国民党抓去，他英勇斗争、坚贞不屈，

已遭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真是坐立不安、悲愤交集。国民党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中又增加了这重大的一笔。血债是必须以血来还的。

1945年6月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进入到酝酿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这一议程。在华中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代表团团长陈毅提议推荐几位在华中工作的领导同志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时陈毅激昂地说：“如果刘英健在，我将力保他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可见，虽然刘英牺牲已3年了，但陈毅还牢记着他对党的贡献和想念着他的优秀品质！

（1982年8月）

从冠尖山到宝塔山

林一心 刘 先 谢廷斋

1939年10月，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奉命到达省委驻金华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准备转赴延安。七大代表龙跃、汪光焕、顾玉良因工作需要而留下，丁魁梅因身孕亦无法成行。

月底，以刘英为团长的浙江代表团一行9人，换上新四军的军装，在两位新四军交通员的掩护下，乘坐民间的公共汽车去云岭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到岩寺兵站后，我们改坐新四军的军用卡车。路上换乘，食宿和关卡检查，均有交通员出面交涉和照顾。作为七大代表，要到延安去聆听中央领导的教诲，亲眼看看革命圣地，这怎么不叫人激动万分！一路上，大家都兴奋地谈论着各自的感受，但当时也没有想到此行去延安，以后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和挫折。

汽车抵达云岭，我们被安排在军部一幢招待所的小平房里。其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曾山等领导同志均来看望过我们。刘英应东南局的要求，在那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7万字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材料。此文后来发表在军部机关刊物《抗战》杂志上，这是刘英留给我们的—份很珍贵的革命史料。

到了11月底，正当我们焦急等待何日出发时，项英带来了中央电令，大意是国内时局恶化，蒋介石加紧反共，中央决定刘英返回浙江坚持斗争。我们都知道刘英同我们一样是很想去延安的，他曾说哪怕到延安待一天看一眼也好。但他接到中央的来电以后则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愉快地接受党中央赋予的重任，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刘英经与东南局商定，张麒麟、郑丹甫和杨思一3位特委书记随他回浙江坚持工作，林一心负责率领林辉山、孙绍奎、刘先和谢廷斋，代表浙江党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同时他们研究决定将浙江各地身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转移到军部另行安排工作。

刘英在返回浙江的前夕，特地把我们5人召集起来开会，一再叮嘱我们路上要服从林一心的领导，要团结互助，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决不能给兄弟省的代表留下不好印象。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把七大精神和各省的经验带回浙江。刘英等同志回浙江那天，我们同刘英等互道珍重，依依话别，大家都希望开完七大返回浙江后能再见面。不料两年后，刘英、张麒麟在浙江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我们在军部的分别竟成永诀。

刘英等离开军部后数日，我们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机关驻地丁家山。在这里同时集中的还有广东（香港）、广西、湖南、江西、闽粤边、福建、上海、苏南等南方八省区的代表。根据东南局的指示，我们共41位赴延安的代表组成了一个临时党支部，以各省区为单位组成党小组。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古大存任支部书记，林一心为支委委员兼浙江代表团党小组组长。为了保守秘密，东南局规定我们对外称“服务团”，古大存任团长，刘先为

一班班长，谢廷斋被临时抽调到团部当秘书。在丁家山，我们还听了一次陈毅作新四军一支队在苏南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报告。

1940年1月，新四军取得铜陵、繁昌地区反“扫荡”战役胜利，这样，我们北上的道路打通了。这月下旬，我们“服务团”，加上炊事班等共约70人，在军部所派1个连的护送下，开始北上。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因局势逆转，我们去延安的路线规定不能走西安等大后方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由于我们缺乏行军锻炼，最初几天每天行程只四五十里。过繁昌后，改为夜行军，向长江南岸芜湖西头的渡口急进，当夜，在北风呼啸中，我们登上两艘大木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成功地偷渡过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登岸后走了五六里路，天已大亮，时值隆冬，纵目江北，村落稀疏，人烟罕少，黄草离离，一片荒凉，真是一江之隔，两重天地。我们觅得一村镇住店，虽说是住店，可到处找床竟未见一张。原来这里都是在墙边屋角，用几块土坯围成一个长方形，地上铺上碎麦秆就算是一个床位。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大家已十分疲劳，铺好行李倒头便睡。

1940年2月初，我们到达江北的新四军二支队队部。支队长罗炳辉亲自带领一个主力团护送我们过津浦铁路，到达来安县城。当时来安县城刚收复，因恐形势变化，未敢久留，即前进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半塔集。在半塔集我们休息了一个短时期，见到了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领导同志。正好这时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从华北调来华中局工作。一天，我们接江北指挥部通知，要我们去参加指挥部的干部会议，有幸听到刘少奇的报告。他讲的题目《从华北的经验看华中的工作》。我们都在

听少奇同志的报告，忽见指挥部一位参谋人员，向指挥部赖传珠参谋长报告：顽军向我进攻，已接近指挥部驻地。赖传珠立即从座位上站起，跑出去布置警戒作战斗准备了，少奇同志仍在继续报告。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军竟来进攻我们，我们就坚决自卫，予以消灭！”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刘少奇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原则和策略。在华中局驻地，我们每人还获得一本最新版本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成了我们边行军边学习的理论课本。

半月以后，我们离开江北指挥部向皖东北行进。皖东北是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的活动地区之一，当时张爱萍领导六支队第四总队就在这里。因我们一时无法北上，部分同志就去第四总队所属的各团、营、连帮助工作。

6月间，我们进入鲁南山区的抱犊崮，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就在这里。再向北，即是沂蒙山区。我们都是夜间行军，每夜要走八九十里，风雨无阻。有时，天空漆黑，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山路崎岖难行，为不使人员走散，我们都解下绑腿布，结成一条长绳，大家挨次挽着布绳前进。因为没有雨具，人们身上都被雨水浇透了。雨停后，衣服又被身上的热气烘干。有的同志行军脚底磨出水泡，歇下来后，就用缝衣针烧红刺破，让黄水留出来，仍坚持行军。下得山来，便是大汶口。考虑到我们多数是“文弱书生”，还有女同志，连日行军已经够疲劳的了。护送部队决定在这里休息两天。不料，第三天凌晨我们却遭到了当地红枪会改编的伪军包围袭击。幸亏这一带的群众好，在他们

的帮助下，我们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途经山东时，我们还到《水浒传》上描写的“梁山泊”地区，但已不见书上所写的当年水泊、山寨痕迹，只见几条河流和一个百米高的小山包。我们由梁山向西北活动到东平地区，护送我们渡过东平湖的是一一五师部队的一个营长率领的加强连。他们送我们过湖后，第二天即原路返回，听说他们在途中遭敌袭击，营长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时，刘先不幸得了伤寒病，发着高烧，寸步难行。一个月下来，几乎吃不下一点东西，病得连头发也一把一把地掉。但在大家悉心照料下，他终于恢复了健康，坚持下来了。

8月下旬，我们靠近敌占的平汉铁路。平汉铁路是日伪军控制最严，也是我们一路上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敌人在铁路两侧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沟壁垂直，沟中灌水，人马无法通过。在可通过的每个路口均有敌人的哨所，并且每隔10来里还有一个炮楼。为越过平汉铁路，冀南军区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护送我们。第一次偷越没有成功，第二次另找小路才潜过平汉铁路的。9月，秋高气爽，我们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方机关驻地索堡。谢廷斋随古大存去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住处，向他们汇报了路上的情况，并请示前进的日程和路线。刘、邓首长非常关心我们，要我们先好好休息，消除疲劳。几天后，我们即在一二九师派出部队的护送下，整装前往驻在晋东南太行山的桐峪一带的八路军总部。

此时正是我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后期，西去延安的路线被敌人严密封锁着，我们只好随总部辗转在太行山区等待时机，

前后约一个月。我们“服务团”所经之处，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老百姓门板睡觉，第二天及时送还并把它上好；每到一地虽然行军很困难，也坚持为群众打扫卫生，有时为群众劈柴、挑水，所以一路上我们深受群众的欢迎和赞扬。但是，想不到，在八路军总部，一次我们却被彭德怀副司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情是这样的：秋末，正是山西柿子成熟的季节，总部驻地的园子里有很多柿子树，那些熟透了的柿子都自行掉落到地上。司令部机关的战士，就从地上捡起来吃了，其中也有我们“服务团”的个别同志。第二天，彭老总知道此事，马上召集全司政后机关人员开大会（也包括当时住在总部的我们这些“客人”），说：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又不是国民党的败兵，为什么要吃老百姓的东西？有人说是掉在地上的，我说掉在地上的也是老百姓的嘛，为什么要吃呢？凡是捡了柿子的一律退还给老百姓，吃到肚里的就赔钱给老乡。过去听说彭老总严于治军，严于律己，这次我们都亲身碰上了，教育很深，终生难忘。

因同蒲铁路被敌人严密封锁，不能通过。我们随晋东南总部活动了一个月，以等待时机。一天，总部派两个团护送徐向前去延安，让我们也同行。为了迅速安全越过敌占区，我们顶着朔风，冒着严寒，在一夜之间接连过了5道封锁线。天大亮后，才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吕梁山区。全程走了140多华里，有的地方是跑步通过的。这是我们路上最长、最累的一次夜行军，走得有的女同志和体弱多病者几乎昏过去。又过了半月，我们行军到达黄河河套边沿的一个小渡口乘船过河。黄河在这里水大流急，好在两岸都是我军驻地，可以在白天摆渡。渡过黄河，即是陕

北重镇绥德。绥德是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里。因为快到延安了，大家都很兴奋，抓紧时间理发、洗澡，一个共同任务是消灭身子的虱子，以免把他们带进延安。我们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袜子，统统放进蒸馒头的笼屉里蒸一遍，才算彻底解决了问题。

1940年12月16日下午，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一年多来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古城，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我们的心头。我们于1939年10月从金华出发，历时14个月，沿途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经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8省，渡过波涛汹涌的长江、黄河，翻越太行山、吕梁山，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徒步行程万余里，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欣喜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到延安后，我们这些代表被安排在中央党校特别班学习。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还亲自找我们谈话，了解浙江省委和各特委的干部配备情况。听汇报后，陈云曾说：“看来浙江党是好的，党的领导均掌握在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同志手里。”

我们到延安不久就是1941年春节，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党校旁的中山食堂宴请我们南方各省到达延安的七大代表。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任弼时、李富春、博古等都来了。毛主席是最后到达的，进来后恰好坐在我们这一桌。席间，毛主席简要询问了浙江的政治形势、党的发展情况和与当时对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统战工作等。我们一一作了汇报。能与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共同进餐，并与毛主席同桌，我们都感到莫大的幸福。

为了等待七大的召开，我们在延安中央党校整整学习了4年又4个月，其间经过了当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干部审查和大生产运动。四年余的学习，使人们熟悉了党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处理一切日常斗争的真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我们终于荣幸地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原闽浙赣的干部组成的南下干部队，离开延安，准备赴闽浙赣三省边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0月初，我们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央电示：干部队伍转向东北，去参加解放东北的战略要地。于是，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我们浙江省的代表和闽、赣等省的代表一起都没有返回原地区。尽管这样，但是应该说，至此我们已胜利地完成了浙江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没有辜负刘英书记生前对我们的嘱托。50多年来，从冠尖山到宝塔山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们投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激励着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原载1994年10月25日《浙江日报》）

参加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一些回忆

邢子陶

1939年我在中共浙江宁绍特委任组织部部长，我向省委提出要去皖南中共中央东南局党训班学习，刘英要我去省委所在地丽水。我在清明前后去省委，刘英叫我先在省委帮助工作，待有机会再去皖南。6月中下旬，刘英先去平阳，我是7月初去的。

浙南平阳我在1937年底已去过一次，那时要成立浙江省委，我们领导的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要请示刘英如何改组，我和顾玉良同去。这次是第二次，浙南的方言我一点不懂，先到温州，找到关系，由那边同志带我去平阳山区基本地区。去后我和郑嘉顺、郑嘉治等住在一起。

刘英叫我担任党代表大会的秘书处处长，实际上就是帮助省委整理些材料。这次大会给我的印象是：

1. 在会上刘英做了很多工作，他不但担负了大会的整个领导和组织任务，还经常去代表驻地谈话，接近代表，熟悉情况，使同志们感到很亲切，不久以后，他就能叫出许多代表的名字。

2. 当时开会地点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但群众却是我们的，乡保长也是“白皮红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虽然大会开得很热闹，有布置得很好的会场，能开一二百人的大会，儿童

团献花，集体宴会……但感到是很安全的，和在城市里或其它地区完全不一样。这是红军挺进师在浙南3年游击战争时打下的基础。

3. 会议结束时，开了一个文艺晚会，很出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多少少年儿童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唱了红军歌曲，使那时一直在白区工作的我，在心灵上感到深深的震撼，它仿佛预示着革命成功那天一定要到来，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这次大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主要是：

1. 我们党在浙江大地上打开了局面，在各地已发展党员万人以上，几乎遍及整个浙江。这是自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2. 自上而下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在浙江省委领导之下，建立了浙南、金衢、宁绍、浙西、丽水、台州等各地特委和特委所属的县委、县工委，浙江全党空前的统一，这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3. 制定了浙江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今后浙江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但这里也应指出，当时浙江省委是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局领导之下的，王明和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可能对浙江党没有影响。这在党代表大会其中的3个文件中可以看得出来。以后也由于对国民党的反共方针警惕不够，致使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造成严重损失。

（原载《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二三事

郑嘉顺

1939年7月下旬，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北港召开。主要议题有三：第一、总结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党的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部署浙江下一步党的工作；第二、选举省委领导机构；第三、选举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次省党代表大会在浙江中共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这里，我只是对当时的几件具体事例作一回忆。

会址的选择：

当时浙江的大片土地已经沦陷。我们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是处在秘密环境中，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千方百计制造摩擦。为了会议的安全，刘英和省委经过仔细分析和调查，选择在温州平阳县北港凤卧乡召开。这里号称“浙江的延安”，是隐蔽的老根据地，红军改编新四军北上抗日，省委机关迁往温州和丽水以后，中共浙南特委机关长期在这里活动。从县、区、乡和村均有坚强的党组织，群众基础好，总的统战工作也搞得好。另外，还有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力量，必要时可以进行自卫。在这里开党代表大会安全是有保障的。

会议文件的准备和起草：

会议文件的形成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作风，所有文件都是领导亲自动手，集体讨论、修改、通过的。会议的政治报告是刘英亲自写的，各个专门报告也是省委其他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同志亲自写的。

为了写好报告，省委领导提前到达平阳，先住在凤卧乡玉青岩村，由刘英主持召开预备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修改补充。对会议文件定稿、翻印，刘英抓得很紧，为了使全省党代表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刘英亲自布置会议文件的翻印，会议结束时，就编印了《大会特刊》，把会议文件编印成册，让代表带回。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临时调了一些同志帮助油印组工作，如当时任中共泰顺县委青年部部长王烈怡就参与了这项工作。

周密的安全保卫措施：

为了确保安全，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都作了周密的部署。龙跃和郑海啸亲自过问，要求做到代表来开会的路上安全进出，并保证会议安全开好。

代表从全省各地集中平阳凤卧乡时，都经过精心化装，有的装扮成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为商人，并经过各个交通站精心安排，派人接送，因此，做到安全到会。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在北港各地动员党员和群众在水头街和山门街以及交通要道秘密放哨，监视和传送国民党军警活动情况。还布置在国民党机关内的共产党员和统战朋友密切注意调查了解国民党地方当局活动情况。

以原来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南特委警卫班为基础，动员特委机关所有工作人员武装起来，临时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武装队伍，

在会场和代表驻地周围放哨巡逻，特别是对冠尖村主会场的制高点日夜警戒，以应付突发事件。

因为开幕和报告发言在冠尖村的主会场，而且参加会议的来宾较多，为避免暴露，大约过了4天，把会议下半段移到马头岗召开。为了保密，采取了夜间行军，要求代表尽可能不穿白色衣服。从冠尖到马头岗要下一个山坡，还要翻过500多米一条山岗，由于刚下过一阵小雨，黄泥路很滑，这对于我们过惯游击队生活的人是家常便饭，但多数代表都是长期在城市做地下工作，在山区夜行军是不习惯的，因此，在转移时就由警卫班和工作人员带领、搀扶着他们。就是这样，仍有人跌跤，弄得满身烂泥，但大家都感到这生活很新鲜有趣，情绪很高。有的代表滑倒时哈哈大笑，喊着说：“我又坐汽车了！”10多华里的山路，就走了近3个小时。

在马头岗我们的会议刚刚结束，就得到消息，山门街的国民党自卫队已经有异样的活动。这样，我们又从马头岗搬到凤林村宿营。

代表们的生活琐事：

会议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充分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从开始到结束，大家情绪都十分高涨。

休息时搞戏剧演出，代表们的歌声不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听郑嘉治演唱《延安颂》，他唱得好，表情又好，听起来很过瘾。唱呀唱，大家就不约而同引吭高歌了。当时没有搞活报剧，但有些开起玩笑来，活龙活现，就像演活报剧。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同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开玩笑。他个子矮又穿一套黄卡制

服，浙西又是沦陷区，许多代表都叫他“日本俘虏兵”，这时，他就表演起来，真的像个日本俘虏。

当时，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干部每月生活费是4元5角，加上1元的零用钱，有时还发不到。会议期间，浙南特委为使代表们开好会，作了最大的努力，确保会议的后勤保障。开幕和闭幕会餐两次，有10来个菜，平时就是三二个菜一碗汤。省委领导和代表夜里工作时，有点简单的夜餐。在马头岗时，半夜后，给刘英送去一碗鸡蛋炒粉干，他高兴地喊道：“今晚是特别优待了！”

会议中天气很热，但没法洗澡，大家只是用木脸盆盛点冷水擦擦身体。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洗好的衣服不能晾在房子外面，只能晾在屋后或树林里。

（原载《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关于省第一次党代会的安全保卫 和后勤工作的几件事

郑海啸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凤卧乡凤林村的冠尖和马头岗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30多人。此外，还有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和为大会服务的人员等，合计将近百人。

省党代会召开前夕，省委书记刘英和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找我谈话，他们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是怯于对外，勇于对内，制造反共舆论，进行破坏活动。指示我要提高警惕，保证党的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英还说：平阳党组织基础好，群众觉悟高，省委决定在凤卧乡召开党代表会，你是浙南特委常委、平阳县委书记，又是当地干部，对情况了解。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就要由你来担当了。刘英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表示对我无限的信任。他停了停又说：省委完全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听了领导的谈话，我心里十分激动。当时，我只说了一句：在省委领导下，我尽一切努力去完成任务。刘英立即严肃地指

出：努力还不够，要保证。接着，刘英谈了开会的具体时间和地址。

根据刘英的指示，在龙跃的直接领导下，我对党代会的安全保卫和后勤工作，重点抓了下面几件事：

一、调整交通员，健全联络站。这是关系到代表们往来的安全和大会的保密工作。县委决定对联络站和交通人员进行认真的调整，选择一批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员，如吴可厚、翁吉生、陈观威、郑志亮、金大巨、郑明德等，护送各地来的党代表直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对于其他人员和信件均在联络站转送，如凤林村的联络站由金澄梅负责，来往人员和信件由她接待和转送。

二、侦察顽军动态，加强情报传递。在大会地址周围数十里内外的主要街镇，建立了情报站，如水头街、山门街、大岙、高楼、腾蛟、平阳坑等地，都指派了专门人员，如林瑞清负责山门、大屯一线，吴可帮、洪汝南负责高楼、腾蛟一线，黄美迎、郑志荫负责水头、凤卧一线。他们的任务，是及时了解国民党军队有否调防，一旦发现情况，就要象接力赛跑一样，迅速地向县委指定的地点传递情报。如遇紧急情况，及时在山上发出情报：白天以烟，晚上以光为信号。

三、反便衣侦探，与顽敌斗智。狡猾的顽固派，经常派人化装成小贩、乞丐或算命先生，钻进山村来，探听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对于这种密探，经过教育的革命老区人民是十分警惕的，并能巧妙地对付，使他们探听不到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对策是：在我们同志住房附近的交通道口设监视哨，发现陌生人，立即发出暗号，如以骂鸡、骂狗的语言，说明有人来了，

以提醒屋里人停止讲话声响。但是，顽固派也千方百计搞突然袭击。有一次，一个装扮成小贩的探子，借口讨水喝，闯进屋来。当时同志们正在里间开会，房主人随机应变，立即以夫妻打架的场面出现，一个拿扫帚，一个拿菜刀，又打又骂，弄得那探子大吃一惊，水也不敢喝，扫兴而去。

四、组织党员，配合机关警卫人员站岗放哨。当时，省委和特委机关的警卫人员，有的不会讲本地语言，遇有情况，不便公开露面，需要有当地党员群众的协助。因此在省党代会期间，凤林村和马头岗村党支部，分别由郑志偶和翁吉忠负责，把党员组织起来站岗放哨。

大会期间，我们还指派当地同志把水井看管起来，以防坏人投毒。

至于后勤供应工作，刘英对我布置任务时，曾风趣地说：老海，这次全省各地区党代表来平阳开会，他们都是你的客人，你要好好招待招待，不能和平时一样老是吃咸菜，要吃点肉。

当时我党处于地下活动，后勤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农村没有粮站和菜市场，又不可能公开到街上采购物品，一切只能通过党支部去筹办。如粮食、肉类分头由当地党员去购买，并亲自送到机关来。蔬菜除购买一部分外，还靠当地党员和群众从自家种的菜中拿出一部分来，并以慰劳的名义赠送给会议。山货和海产品是通过凤卧街黄加木、郑叔铭、郑志通等小商店协助，秘密购买来的。

大会闭幕式上，省委邀请当地党支部书记郑志偶和德高望重的支持革命的老人郑志西、郑学超等参加会议。晚上搞了一次会

餐。凤林小学的师生，还为大会演出文娱节目。郑学仁代表少先队员在会上致贺词。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冠尖山新楼宣告圆满成功。

（原载《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省第一次党代会的保卫工作

廖义融

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1939年7月间在平阳县冠尖和马头岗村召开的。

代表30多人^[1]，来自宁绍、金衢、台属、处属、浙西、浙南特委及省委机关。有的代表化装成商人，有的化装成教师，冒着生命危险越过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踏上了又陡又窄、曲折崎岖的山岭，上了冠尖山——大会所在地。大会由刘英主持。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工作经验，特别总结了坚持浙南8个月艰苦奋斗的经验，部署了今后的革命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共浙江省委员会，选出了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是怎样做好这次党代表大会保密、保卫工作的？首先是要做好大会的绝对保密工作，才能确保大会的安全、胜利召开。因党代表大会虽然是在基本地区的冠尖、马头岗山上召开，但当时这个地方的附近都驻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还有特务、便衣队。本村亦有反动分子长期蹲在离该地20华里的水头区署。

国民党不抗日，而是加紧策划反共、反人民。曾查封了新

[1] 参加会议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应为26人。

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了省委的两位领导人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派遣特务、便衣队，打扮成讨饭的、算命问卦的、做小买卖的，窜到基本地区来活动。或白天以派捐税，夜里以拉壮丁为名，来我基本地区挨家串户地乱窜，妄图收集情报。当时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处境非常困难。我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在一个穷山区突然增加了代表和工作人员几十人，吃的、住的都是问题，特别是保密、保卫工作难度更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千方百计做好代表们吃住的安排。龙跃在大会前一天告诉我们警卫班：“有件绝对保密的事告诉你们，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要放在我们浙南冠尖召开，明天代表就要到了。”并说：“你们是武装同志，要化装成同当地农民一样，要依靠当地群众做好大会的保密、保卫工作，首先要做好大会保密工作。”当时我们警卫班听了这好消息都非常高兴，但又感到我们只有20来人，不用说没有机枪，就是连步枪也没有，仅有10多支旧短枪，万一发生意外，怎样对付张牙舞爪的国民党顽固派？因此感到责任重大。但我们深信只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再大困难也能战胜。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勇敢地、愉快地接受这个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遵照龙跃的指示，警卫班分为两个班、一个武工组。第一班负责大会所在地保密、保卫工作。第二班负责离大会6华里的鸡子山和大墩地方的保卫工作，主要对付山门镇的顽军和特务便衣队。武工组7人负责大会所在地10华里的赤沙地方的保卫工作，主要对付赤沙的反动地主、特务和北港区的顽军及便衣队特务。我们警

卫班分成3路后，化装成农民深入群众，同地下党支部和基本群众打成一片，做好大会保密、保卫工作。

我们依靠地下党支部，做好基本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党的保密、保卫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做到了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召开党代表大会没有告诉他们，只说最近同志多起来了，要注意保密、保卫）。因此他们对外来讨饭、算命问卦以及做小买卖的，凡有可疑的都采取了监视、防范和应急措施，并及时向我们报告。如大会所在地冠尖有个反动分子，长期蹲在北港区署。当会议开到中途，他突然窜回。群众发觉后就来报告，地下党支部就布置他所住的左邻右舍的基本群众，监视其动向。这家伙在当天下午就窜回水头据点，我们的情况没有被他得去半点。我们向刘英作了汇报，刘英立即同龙跃、郑海啸等商量。刘英说，这个反动分子上午回来，下午就走，我们情况虽没有被他发觉。但大会在这里已开了好多天了，恐怕时间长会被敌人发觉，但要注意防范。商量后决定在当天夜里转移大会会址。为了大会安全转移，我们配合地下党支部做了大量工作。如当地很多农户养狗，夜里狗都守在主人家的大门外，发现陌生人大叫起来，甚至扑过来，对大会转移是个很大威胁。我们掌握这情况后，就配合地下党支部做好养狗农户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都把狗关到屋里去了，使代表们在深夜安全地转移，连当地基本群众也没有觉察到我们的行动。

发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用。我们对当地开明士绅和上层人士做团结争取工作，很有成效。一些保长、开明士绅被争取过来后，替我们办事，有敌情就向我们报告。如当地一个保长被我们

争取过来后，替我们到国民党据点探听动静，并把探听到的情况向我们汇报，使我们保卫工作争取了主动。

警卫班人员发扬高度革命责任心，树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机警、敏锐地坚守在工作第一线。白天和地下党支部同志及基本群众打成一片，做好保密、保卫工作；深夜还不辞劳苦出去巡视，警惕敌人动向。我每天夜饭后总要到刘英住的房子里看看，没有什么意外，我才放心。刘英看到我，就问保密、保卫情况。有一次刘英问我：“阿三，我们这么多白汗衫晒出去（当时是夏天），会不会暴露目标？”我说：“不会的，白汗衫都晾在毛竹丛里，外面是看不到的。”刘英说：“那很好，要提高警惕呀！”

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发挥了地下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争取上层进步人士，发扬武装人员高度责任心，战胜了当时的重重困难，使党代表大会能安全地圆满成功，代表们带着大会的精神安全地返回自己地区。

（原载《光辉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文献资料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决议

（1939年2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最近不久的时间实行召集，所以省委特号召浙江全党同志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来进行准备工作，加紧进行这个有极重大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与选举工作。为此省委特决议如下：

（一）各级委员会要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党员中形成一个极热烈的运动，并把这运动的政治动员工作，从各级委员会普遍深入到支部小组中去，使每个党员都深刻明瞭七全大会的特别重大的意义，都极热烈的参加各级代表选举运动，以培养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高度发挥党员的积极性。

（二）政治动员工作：<第一，>^[1]关于第七次代表大会意义的讨论：1. 它将总结过去十年来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2. 讨论国际国内的新政治形势。3.

[1] 文献资料部分删节处用“（略）”表明，明显的错别字在“〔〕”中订正，增补的漏字用“〔 〕”标明，多余字标以“<>”。

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法与计划。4. 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更积极参加抗战。5. 并讨论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与扩大自己，巩固自己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按级选举工作的意义与必要。

（三）在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我们要进行一次普遍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工作检讨运动。从这次检讨中来教育同志，审查干部，提拔与引进大批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仰的新干部，以至建立与健全各级委员会。并要各级党组织规定出几项具体的中心工作与任务，使我们浙江党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在巩固党的组织与发展党的组织上达到应有的程度，特别是在加强组织生活与党的纪律，加紧党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以普遍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同时应该努力用各种各色的组织，把无组织的群众团聚到抗日战线上来。

（四）立即开始切实进行按级选举代表的工作：

1. 各特委统限于四月中旬前召开特区代表会，选举出参加全省代表会的代表（浙南特区10人，××特区5人，××特区1人，××、××、××等特[区]各1人），再由省代表会选举出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浙江省代表。

2. 出席特区代表会的代表由县代表会选出，县代表会日期由各特委根据情形分别决定，出席县会的代表由各该县的区代表会选出，出席区代表会的代表由支部党员大会选出，没有区委或仅一二区委的县份，县代表会的代表可直接由各支部选出，还要再开区代表[会]（日期由县委决定）。

3. 特区代表会及县代表会等的出席人数要按照各地的客观环境及各级党组织下党员的质量与数量的比例来决定（务<必>须注意到秘密文件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

4. 各特委县委并要注意做到使最忠实于党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仰的、最积极工作的[党员]当选到各级代表会中来，以保证各级代表会的成功。

5. 各级举行代表会议时，应根据各地环境是否允许召开，否则，[应]指定出席上级会的代表名单。

6. 在各级代表会中，还要讨论到各级机构的健全、中心工作的决定及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提案等。

7. 召开特区代表会及县代表会所必须〔需〕的最低限度的经费，由各特委县委自行筹划，不足的由省委酌量补给，并希预先将必要的开支作一预算[报]到此间。

中共浙江省委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1939年7月下旬）

当六中扩大会议再次宣布召开全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浙江党之后，全浙同志都兴高彩〔采〕烈的预祝其顺利的召集与胜利的完成。并积极的传达与讨论六中扩大会的决议到支部中去，到群众中〔去〕，以求在具体进行中加紧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以扩大与坚强抗日战争的雄伟阵势，以求熬过艰难的阶段，准备反攻〔攻〕力量，作为七中全会工作的准备。

今年二月间，浙江党接到东南局关于七全〔大〕会的召集，各地党应如何的去进行具体的工作指示后，省委立即通知各地各级党在发扬已得到的成绩和加倍的动员全浙同志积极的工作中去召集各地党的各级代表会。现在各特委领导下的代表会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得到许多工作的经验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到省委来，这是浙江党一年多工作以来的重要成绩之一。

今天各地代表都具备着战斗的精神，来到了省代表大会的会场，这是浙江省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光荣大会。这个会议虽然不是主要的城市开幕，然而是在开展整个浙江党的工作的发源地

区开幕的。这次到会的代表虽然并不很多，然而他们是代表将近×××党员的意见来出席大会的，是代表浙江和边区二千七百万拥护党与拥护抗战的民众的意见来出席会议的，因此这次会议负有极其重大的使命与繁重的任务，在浙江党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我们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前面：

正当全世界战争危机日加紧迫的环境中来召开的。

正当敌我苦战的过渡阶段中，在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准备反攻的时候召开的。

也正当敌人在浙江沿海沿江加紧骚扰威胁与进攻中，在浙江从辅助地位转向主要地位的时候召开的。

在这空前紧张的局面下，我们在大会上要检讨与总结抗战二十四月当中和浙江党过去的工作经验，主要是检讨建立与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我们要讨论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的形势，要讨论如何加强组织动员全浙江的工人阶级及各业各界人民更积极参战。讨论如何更严密的团结国共及其他抗日党派，集中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战胜利。讨论如何在长期抗战长期合作中，争取胜利的方针与计划，讨论如何扩大与巩固党的基础去加强抗战力量。此外我们在大会上，要选举各地党在群众在同志中有威望的代表出席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选举新的省委委员，以加强浙江党的领导工作。

总结起来，我们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在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及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与国民党同志亲密合作及团

结全浙一切抗日党派与一切爱国同胞共同克服新的困难，增长抗日力量，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浙江，阻止敌人的占领与进攻，配合前线各战场的英勇行动，驱逐敌人出浙江，出江南，以致驱逐敌人出中国，以达到建立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新中国。我们相信浙江党的全省代表大会及全国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一定会胜利的完成，我们更相信战胜敌人与建立新中国也一定会胜利。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1939年7月下旬）

同志们：

现在大会正式开幕了。

首先我代表省委向远道到会的各代表、各来宾及列席的全体男女同志，敬致热烈亲切的慰问。

自省委成立以来，我们浙江党的工作，已得到相当广泛的开展。这一面是由于中央——东南局领导的正确，另一面也由于省委各同志，各部委人员，各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及全体同志工作的努力，与对党[的]事业的英勇与忠诚，对策略路线运用的灵活与机敏，和广大群众的一致拥护与努力所致。因此使这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庄严隆重与盛大的浙江省我党代表大会，今天能在这里——经过三年艰苦斗争的基本地区，正式开幕。因此，我在此代表省委向诸同志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并预祝大会的成功。

现在我把省代表大会的准备经过报告一下：

当六中全会宣布了召开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后，浙江

党在今年二月间得到东南局的明确指示，当时省委就用极大的注意力，具体布置了这一工作，责成各级党以埋头苦干的精神，用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中央对七次大会的伟大的号召。同时各级党自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在四个月的准备期间，能够做到深入全党去讨论和执行。因此在全浙党一致的执行之下，使这次大会的成功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次大会的意义可以归结成为下面六点：

第一，要把浙江党自临时省委成立以来一年多的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精神加以批判的总结。

第二，要总结过去一切工作经验和教训，克服党内一切存在着的弱点与缺点，并把我們某些地方的优点，普遍的发扬[到]浙江全党中去。

第三，要根据上级指示，根据浙江实际情形，来具体讨论和决定今后浙江党的任务和总方针。

第四，检讨浙江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与加强国共亲密合作，团结各抗日党派，动员全浙江人民参加一切抗战工作。

第五，要重[新]改选省委，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选举出新的省委名单。在过去一年多中，省委的工作虽有着一些不可磨灭的成绩，但为了要适应新的战斗环境，百分之百的完成党的任务，应该把省的领导机关加以更好的健全。而且不仅是省的，还要把各特区的、各县的、各级党的机构也重新加以健全和充实。

第六，要选举党内及群众中最忠实、最优秀、最有威望、最有办法的干部为出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次大会的召集，正处在国际形势非常紧迫，抗战正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困难时期，日寇正在浙江沿海沿江蠢动和骚扰的时期。在这斗争更为紧张和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全体代表必能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精力，来正确地讨论今后具体的任务和方针。我们坚信，这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行程，不仅能给日寇以极大的打击，而且必能完成历史所给予我们浙江党的斗争任务。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1939年7月下旬）

一、目前国内外政治形势

（略）

二、浙江政治形势

目前浙江的形势是正在变动中，抗战第一阶段的时候，东南只处在辅助地位，而今天则已转到主要的地位。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日寇的主要企图是削弱我主力，占领我大城市一举而灭亡中国，所以着重向华中西南与西北猛进，而现在则因攻势衰退，采取了相机进攻及巩固占领地的所谓“以战养战”的方针，因此自从南昌失陷以后，东南的地位就日渐转变[得重要]起来。

（一）浙江形势<的>转到主要的地位，表现在：

1. 敌人在沿海占领了定海，窜登温岭与玉环，并加紧骚扰温州、宁波、瑞安、平阳、乐清一带，抢劫商轮与封锁沿海，在富春江沿岸亦不断炮击萧山等地，并在浙西作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大批敌机的轰炸，这与第一期中有很大的不同，过去还只是零星骚扰，现在却是大规模的不断的轰炸本省的主要城市，这是敌人扰乱我抗战后方的人心，破坏我后方经济的有计划的企图。

3. 汉奸托匪亲日派的活跃，这从宁波温州等处托匪的活动，台属、处属、闽浙边汉奸托匪们组织的土匪的活动，海门敌舰骚扰时汉奸的纵火，以及以某些顽固分子为依据的暗藏奸徒在各地的活动，都可得到说明。在这种转变的形势中，我们来分析一下浙江的政治情况，是很必要的。

（二）在进步方面，政治上是表现在：

1. 1938年2月省政府颁布了战时政治纲领，在里面规定了战时重要的施政方针，及民主政治的初步实施，这是浙江的一个重要进步。

2. 各县行政机构的调整，如先进县长区长的任用，信任与提拔了部分先进青年来担任职务及惩办与撤换贪污分子等。

3. 保民大会开始普遍的举行，及乡镇保甲制度的改革，现在省政府已明白规定保民大会不但可以提出问题，而且可以建议，可以组织特种委员会，可以撤换和改造〔选〕保甲长，及对年高的、贪污的乡保甲长的调换，与待遇的相当提高等。

4. 组织各县及省直属的政治工作队。根据统计，全省队员已有二千余人。他们大都是热血的青年，在各地经常的做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参加各种抗战的工作，赞助召集保民大会，解释政府法令及改善民众生活的工作。这对浙江各种抗战工作的确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5. 举办了各种政治军事青年妇女等干部训练班，受训出来的干部现在已有万人左右，此外如乡保甲长训练班和民众自动组织的训练班等还不计在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6. 省议会会议的召集。省议会通过了浙江省二十八年度七大施政方针，对政府坚持抗战方面给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并决议在年内成立各县参议会。

7. 民众运动相当活跃。在各处我们都能看到各种救亡团体的活动与职业团体的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的努力，另方面也是由于民众运动在浙江的比较自由。

（三）在军事上的进步，是表现在：

1. 地方武装半武装组织相当的普遍。如纠察队、任务队、战时服务队、后备队等在全浙各地差不多都已个别的建立起来。这些组织，一方面训练了民众，一方面就是战士〔时〕武装组织的补充队伍。

2. 全省地方自卫团队的建立。全省及各县国民抗敌自卫团队建立，这对民间武装相当多的浙江，在抗战上是有重大意义的。现在经常〔性的〕抗日自卫团队全省已有××万人。

3. 军队中政治工作制度和文娱娱乐工作的初步建立，及某些新部队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设立，这对加强士兵民族意识与抗战情绪，消除官兵间的隔阂，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上面，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4. 扩大兵役运动及优待出征军人家属，都已在逐步实施中。现在自动应征的志愿兵役较前更为踊跃，这一年来全浙的自愿兵就至少有×千人以上。同时在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上，已有进

一步的切实实施，如缓役免捐及发给安家费与经常的津贴及慰问等。

5. 各种的地方营、妇女营、青年营及军事训练班的建立。自抗战以来，在浙江几个主要城市及主要地区里已相当普遍，如绍兴、金华、温州、丽水等地都有设立。

6. 军事工业的创办，尤其是浙江建军上的一大成绩。现在政府正在尽量做到军需品自给的原则，在浙江抗敌后方的××等地，已有×××等的军事工厂可以供给部分的武器。

7. 对沦陷区武装动员工作，比前有更大的进展，如浙西汉奸武装的清除，各种游击队的整理与统一领导，以及一部分军队有计划的深入浙西前线与敌后方，阻止与牵制着敌人的继续向前进攻与深入。

（四）在经济上的进步，表现在：

1. 物产调整处的设立。对农产品及其他商品运输的调剂，以及对茶、桐等出产开始大规模的放款，使重要出产的输出，茶农桐农的生活都有相当的增进和改善。

2. 发展和奖励手工业。如各种手工业指导所的建立，平民织袜厂、难民工厂的开办，特别是处属数县对手工业合作事业等的积极提倡与奖励是已得到较大的成绩。

3. 对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的奖励及帮助。如宁绍处属温属各地合作社相当普遍的建立，合作金库的专办合作放款，及最近茶农合作社有计划的建立等。

4. 在浙江抗日后方轻重工业的创办，如织布厂、染织厂、发电厂、机械厂不断的建立等。

5. 春耕冬耕及垦荒运动的开展。如去年云和、遂昌、龙泉垦荒十万亩以上及政府对春耕冬耕的帮助等就是证明。

6. “二五”减租，在许多地区相当普遍的实行。如绍属诸暨、余姚，乐〔处〕属云和、龙泉、遂昌，而尤其是温属各处，有着很大的成绩。

7. 省政府对经济财政政策的确定，如火柴香烟的公卖公营，进出口主要货物的专买专卖与商品的专运。这对浙江经济财政的独立与自给自足，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五）在文化教育上的进步，表现在：

1. 书报刊物出版贩卖比较自由。如抗战以来先进刊物报纸在浙江出版的至少有百种左右，新书店开办的有几十家，先进书籍的销路更是广泛，这在他省说来，是很难做到的。

2. 各种学校的创办和转移，如英士大学的创办，联合中学和浙西临时中学的设立，高中、初中、师范的迁移，以及偏僻县份穷乡僻壤间公私学校的设立等。

3. 教育行政方面。现在全省划成五个教区，并把各中学小学教员分期轮流加以训练，这对战时教育的推进<上>，也是很好的措置〔施〕。

4. 对沦陷区域文化教育的注意。如民族日报、浙西日报及其他刊物的创办，书报供应社的设立以及每日输送几千份其他的报纸刊物到前线到沦陷区去等。

（六）所以浙江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它都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时，<它>也有着它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

1. 当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清楚认识，党政军不能很好团结一致来加紧抗战工作，门户的成见尚深，对共产党员及进步的国民党员有些地方仍发现威胁、逮捕甚至暗杀等事件。如诸暨党部特派员傅文象、民教馆长黄日初及抗卫会委员王静安、徐季绪等国民党进步分子的被暗杀，以及在温州、金华、宁波、浦江、汤溪各地共产党员的被逮捕被监禁等<事实>。

2. 最近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控制与摧残。如生活、新知等书店的被封，《东南战线》等先进杂志的被禁及进步救亡团体的被解散，这样摧残抗战文化事业，实是极可痛心的事，在浙江抗战上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3. 对积极从事抗战工作的进步的官吏的撤换，如诸暨、遂昌、云和等县的县长，及其他进步的公务人员，最近都遭到了很多的调换。

但有人根据<了>这个理由，以为“统一战线首先要在浙江破裂了”“革命的低潮到来了”，因此就说：“工作不好做，要调动工作了”，这是完全不对的。

上面已经说明，浙江在抗战上在统一战线上，整个说来，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最近这些不良倾向，却只是局部的、一时的，是统一战线进程中或多或少总难完全避免的现象。浙江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整个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展中，这些现象更是局部的局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在这些“局部的局部”的波折中得出“统一战线破裂”和“革命低潮”到来的结论。

我们确信，这些跟着抗战新阶段而到来的困难，必然会跟着

抗战的进展而被不断克服。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些缺点还不能把他〔它〕减到最低限度，我们自己在某些地方对策略方针运用的不灵活不妥当，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怎样来克服这些缺点呢？

（1）应当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有清楚的估计和明确的认识，明白目前是处在什么阶段，可能发生什么困难，要怎样迎接困难，如何克服？

（2）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友党的缺点，应当经〔通〕过各种关系，三翻〔番〕四次的、四面八方的去加以说服推动。我们要明白他们是在抗战，整个说来是进步的，只要我们能够和他们建立正常关系，有远大眼光，不但明白对方的缺点，而且明白自己的缺点，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减少摩擦，做到互助互让、诚心诚意、真正手携手的把一切力量都放到战胜日寇的上面去。

（3）在有利于抗战的原则下，对某些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分子，当一切说服推动办法完全绝望以后，我们应用广大群众力量及争取进步的与中立的分子的办法来孤立他，影响与教育他。并以此来教育同志和广大群众。

（4）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守不暴露、不刺激、不威胁的三不政策，一切出风头，想迁移到好的环境中去，以及不肯埋头苦干的倾向都应该彻底克服。

（5）要严密党的组织，加紧党的教育，把〔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际，不但教育全党同志，而且教育广大的群众。我们要抓紧过去实际工作中血的教训来警惕全党，使一切错误不再重复。

三、我们今后的任务

我们今后的任务总的分成七点：

第一，加紧全民动员，武装保卫沿海，保卫浙江，打退敌人的进攻。

在目前浙江的紧张环境下针对着敌人在定海、玉环、温岭的登陆与继续进攻沿海各地，我们全浙人民的紧急任务就在于协助政府和军队加紧动员民众参加军队作战，以武装保卫沿海并广大〔泛〕开展浙西游击战争，打退敌人的进攻。因此：

1. 必须调集大量军队充实沿海防务并积极抵抗敌人在沿海的进攻，打退已登陆的敌军，夺回温岭、玉环与定海的失地。

2. 必须积极动员群众参加军队并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实行全民武装与保卫家乡的工作。

3. 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并改善士兵待遇，提高全军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及与民相亲的作风。

4. 疏散沿海密集的人口，移植到内地后方并迁移沿海城市工厂实业，实行坚壁清野，以免人力物力资敌及遭敌人的摧毁与蹂躏。

5. 必须广〔扩〕大发展浙西游击战争，广泛组织沦陷区民众参加游击队，以破坏敌伪政权并牵制大量敌军，阻止敌人的进攻。

第二，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克服摩擦，以推进国共合作与全民族的更加团结。

因为在目前形势下，<一面>敌人正集中力量进行破坏国共合

作与全国团结的政治阴谋，<一面无无论>[全]国<内>与浙江国共两党的摩擦是增加了，并在政治上局部的表现着逆流的现象。因此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是在于拥护蒋委员长与政府，拥护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与全民族的团结，揭破日寇汪逆的一切政治分化阴谋，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的>统治中国。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克服过去的作风，做到不突出、不暴露、不刺激、不威胁的地步，并加紧统一战线工作，以调节与增进国共两党的关系。同时，在共同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本着互助互让的友爱精神，减少摩擦，减少意见分歧与纠正某些曲折的逆流现象，并要号召全体人民严密注意敌人托派亲日派汪逆汉奸与某些顽固分子在我们内部挑拨离间制造不满、制造摩擦的阴谋鬼〔诡〕计，从加紧肃清汉奸的工作中给以最大的打击。

第三，加紧国民精神总动员，提高民族意识与战斗意志，克服悲观动摇情绪，反对投降企图。

目前，浙江在新的变动形势下，必然有一部分人，因敌人在沿海的登陆与某些城市的被占领，而发生对持久抗战动摇悲观与失望的情绪。因此，我们的第三个基本任务是：在于加紧国民精神总动员，提高自信自尊的民族意识与战斗意志，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动摇与失败情绪，扩大和加强全国人民对持久抗战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投降妥协的企图。为此目的：

1. 必须动员各种民众团体、报纸、刊物、学校、军队与政府机关切实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

2. 广泛进行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克服悲观动摇情绪，加紧全民团结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复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

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

3. 要说明目前战局的某些大小胜利，汪逆汉奸投降妥协阴谋的失败，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某些进步与克服困难战胜日寇的方法等。

第四，争取省参议会的民主，促进保民大会的实施，以推进民主政治。

为适应抗战的迫切需要，加强全民族的团结与积极动员全民的一切生动力量，所以我们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实行抗战时期必要的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但要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实事求是的从实际设施方面着手。因此：

1. 要努力争取省县参议会，使它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民意机关。

2. 要充实保民大会的内容，实行民选乡保甲长并使它成为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础。

3. 要保障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的充分实施，并要推动广大群众反对随意限制与无理封闭民众救亡团体、书店、刊物，逮捕抗日前进分子的现象。

4. 要促进改革各级行政机构，并纠正军事机关滥用法令等现象。

第五，实施对敌经济封锁，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

在敌人对我加紧进攻，我之经济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形下，我们的第五个任务就在于实行新的战时经济政策，加紧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破坏，及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具体的说，对[付]

敌人的是：

1. 要使我们一切财产、物产、原料生产品不供给敌人，严厉实施对敌封锁与统制。

2. 要配合政府的法令与民众的积极自动实行抵制日货的运动。

3. 要对敌人的工厂、矿场与公路、铁路交通实施破坏，使敌无法开发我国经济，以达到它利用我国人力、物力、财力灭亡我中华民族的毒计。

另一方面要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有计划的建立各种小规模机械工业，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合作事业，并执行节约和征募运动，以达到我们抗战经济自给自足的目的。

第六，改良民众生活，救济难民、饥民、失业工人与青年。

不改良民众生活，不使人民实际上知道国家政府的可爱，是不能够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的，因此我们的第六个任务，是要配合抗战工作来进行各种改良民众生活的工作。

1. 要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特别是目前温州、宁波等地广大遭难工人、贫民与渔民。

2. 要救济各县山区里吃草根山土的饥民。

3. 要切实实施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的条例。

4. 要普通实行“二五”减租。

5. 要铲除对盐民的种种剥削及改善他们的非人生活。

6. 要调剂粮食及日常必需品，评定物价。

第七，动员与组织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民众运动，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

抗战现在正遇到新的困难，唯有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才能有效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我们若没有普遍发展的并统一的民众运动，要支持长期抗战是不可能的。在这里：

1. 要做到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民众抗日的自由，纠正一切以合法为名，其实则进行统制、包办与摧残、阻拦等现象。

2. 要健全与充实已有的民众团体，认真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这些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与文化团体里去，并使这些团体依照地域与职业两原则建立起联合的统一的组织。

3. 将青年、妇女等按照其切身利益与特殊需要，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并动员参加各种抗战工作。

4. 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发挥各群众团体自己的作用，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

上述七项紧急任务都要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各党派、各阶层以至全民族，在拥护政府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坚决实行起来。我们浙江党，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成为动员全体民众坚决实行这些任务的先锋，要达到此目的与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就非发展与巩固我们的组织力量不可，所以发展与巩固我党的组织力量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先决条件，它在这里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完了，我们为了要完成中共七中全会、浙江省代表大会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任务，必须发挥过去埋头苦干的精神，用最大的努力和决心，根据如上七个中心任务和各地具体

环境适当配合起来，推动全党全民，使它迅速实现。我们确信当各位代表回去以后，各方面定有大踏步的转变和开展，我们确信只要我们正确的执行党的策略战线，钢铁般的团结一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

——《党的建设问题》

（1939年7月下旬）

（一）怎样做一个模范党员？

甲、培养模范党员的意义：

1. 模范党员可以提高全党同志的素质，使全党党员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2. 为要达到六中全会向全党同志提出的，要全党同志在各种工作中、生活中起积极的模范作用，我们应该进行模范党员工作。

3. 在目前党大量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某些不良倾向，因此，为要更团结巩固我们的党，模范党员实有重大的意义。

乙、模范党员的条件：

1. 承认及执行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党纲及党章，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2. 自觉的遵守党的纪律

①遵守及执行党的一切决定。

②要有稳固的阶级立场及坚定的党的观念。

③严守党的秘密。

④自动的按期到会及缴纳党费。

3. 要有高度的工作积极性：

①牺牲个人利益，一切为党工作。

②在党的指示下参加各种工作。在工作中，不但要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而且要扩大工作的成果。

③要有独立自动的工作精神，及艰苦卓绝的作风。

④不但不怕困难，而且要有迎接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办法。

⑤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要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⑥经常做发展党员的工作。

4. 要虚心的积极学习：

①要具有革命的知识与政治的远见。

②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政治时事与军事。

③要研究党与群众工作，接受实际工作经验与教训，并学习新的工作方式。

④要帮助与督促同志学习，并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5. 应成为群众的模范：

①对中华民族解放及无产阶级事业具有无限忠诚和牺牲精神。

②深入群众，为群众利益而奋斗，并要善于领导群众斗争。

③要刻苦耐劳，积极工作，大公无私，处处以身作则。

④在军队中，应是英勇作战的先锋，执行命令、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团结内部的模范；在与友党友军及全国人民的关系上，应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坚持抗战建国纲领，诚心诚意的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成为执行统一战线的模范；在政府中，应该成为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运中，应该是群众的朋友，不是群众的上司，应该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在落后的群众中，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尊重他们，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6. 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①坦白的诚意的承认，并克服自己的错误。

②要有耐心说服与纠正同志错误的精神。

③积极的向不良倾向斗争，保卫党的团结一致。

（二）在党政军（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基本的任务、工作方式、及态度应怎样？

甲、任务：

1. 经常贡献我们正确的意见与建议，向党政军当局宣传解释党的新策略路线以争取上层，推动其进步，并团结进步分子。对党政策中友党人员及其他分子，对我党策略路线不了解或误解曲解〔解〕的，应加以适当的解答。

2. 要把握政府，积极推行抗战法令，帮助与推动党政军进行各种抗战动员，培养民主，改善民生的工作，并广大动员与组织各阶层民众。

3. 执行党的指示，并经常向党作工作报告。

乙、态度：

1. 要用热心爱国救亡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

2. 要做什么象什么，说话行动，待人接物，生活起居，要适合自己的职务与地位。

3. 要做到不激不躁，不卑不亢，不暴露自己的目标。

4. 要有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恳切稳定，坚忍沉着的作风态度。

丙、方式：

1. 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照顾将来。

2. 要了解与把握对方，不要因他们一时在党派和其他问题上的错误与成见，一次说不上他们，就失掉耐心。要在落后分子中保持警觉性。

3. 要发扬对方的优点，多做积极的建议与帮助，少做消极的批评。

4. 要抓住对方最感困难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切实帮助他们（有利于团结抗战的）。

5. 要忠实于本职工作，有刻苦耐劳热烈工作的精神，与处处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

6. 要不失立场，坚持原则，有气节，有操守而不是做别人的尾巴。

7. 一切工作要共同商量，共同负责，共同进步，克服过左的先锋主义作风。

8. 上下层工作要有适当的划分与配合。

（三）什么叫做模范支部，怎样建立模范支部？

甲、模范支部的基本条件：

1. 能够领导群众，成为群众组织的核心，组织群众团体在自己周围并团结群众中有威信先进分子。

2.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并配合当地特殊情况去计划布置工作。

3. 每个党员自动按期到会，缴纳党费。

4. 每次会议要有工作检查和布置及与工作布置密切联系的政治问题讨论。

5. 根据特殊环境去确定特殊任务，定期起草健全的自动独立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日程，建立检查和报告制度。

6. 要有经常的对党内党外作基本理论和路线的宣传，有自我学习及教育工作计划。

7. 要经常吸收新党员。

8. 严格执行自我批评。

乙、怎样建立模范支部：

1. 普遍深入的讨论什么是模范支部，为什么要建立模范支部及怎样建立模范支部。

2. 要先选择在重要产业部门重要地区，能起中心作用的支部，去改造与健全它。县级以上的领导同志要深入该支部，切实检讨与指导他们的工作。

3. 健全支部干事会，积极提拔与适当配合〔备〕优秀干部，担任支干会工作，并适当的分配各个干部负担各个别工作。

4. 加强党的教育与经常作政治动员，以提高支部同志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四）怎样领导支部？

甲、原则与态度：

1. 要深刻了解支部本身情形及周围环境，不要用主观的尺度去测量同志。

2. 不要从领导个人的观点出发去处理问题，要静听同志的报告，尊重同志的意见。

3. 不要代替包办，养成依赖性，不要命令转照，要切实帮助其工作。不要事事干涉他们，应启发支部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发扬其优点与克服其缺点。

4. 要以同志的友爱态度对支部同志，关心每个同志的困难和切身问题，并尽可能去帮助他解决问题。

5. 同志对错误和问题的了解，要耐心的一次再次的去说服和解释。

乙、会议：

1. 会议前帮助支部，充分准备一切，如政治形势与工作环境分析，上级指示的如何传达，工作计划的起草，议事日程的确定等。

2. 会议时，要静听各同志的报告与意见，并检查上次决议的执行程度。

3. 抓住工作和问题的中心，帮助支书适当的分配和布置同志工作。

4. 要征求同志对上级的意见。

5. 要注意会场的布置。

丙、工作与教育：

1. 帮助支书如何具体执行决议，必要时要找支干同志作个别谈话，指导工作与鼓励他们的工作热情。

2. 根据各别程度去确定教育步骤，以加强理论与实际工作的教育，并使之密切灵活联系起来。

3. 对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传达党的重要决议和论文时，要用他们熟悉的词句和譬喻，耐心的说明和解释。

4. 随时必要〔须〕注意不良倾向，正确进行批判与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五）什么叫做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政策，应怎样去正确执行？

甲、干部的标准：

1. 对党对工人阶级事业有无限忠心。

2. 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得到群众信任的同志。

3. 要有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有不怕负责、不怕困难与顽强斗争的精神。

4. 有适当的工作能力，并肯虚心学习。

乙、要经常的了解干部，要在斗争在工作中及各方面去识别干部：

1. 干部的来历与履历、社会关系、个性。

2. 政治上的坚定性，对党的策略路线的了解与执行情形。

3. 了解他的工作与学习精神。

4. 了解他的工作经验与实际能力。

丙、提拔与培养干部：

1. 要[把]有组织的耐心的去提拔与培养干部，当做经常工作之一。

2. 要培养独当一面的干部与在群众中有声望的和感〔威〕信的、有专才的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与当地干部。

3. 要慎重考虑与大胆提拔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与专门人才干部（不要专门看说话漂亮，不要简单以成分为标准，不要专看老干部，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越级提拔）。

4.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如个别谈话、召集会议、开训练班、带徒弟方法等去训练干部。

5. 必须经常的向干部解释政治与策略问题，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

6. 要从具体切实指导与帮助工作去培养干部。

丁、使用干部：

1. 发其所长，克其所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2. 要信任干部，而不是处处干涉与牵制干部。

3. 要鼓励督促与帮助干部，而不是包办。

4. 要把最坚强的干部放在重要部门与地区。

戊、爱护干部：

1. 关心他的日常生活。

2. 尽可能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

3. 要注意他的工作与环境是否适当，如有严重障碍与威胁，应迅速调动。

（六）如何加紧团结干部，如何经常审查干部及怎样去进行洗刷政治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份子？

甲、团结干部的办法：

1. 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使干部思想言论上、组织上与行动上一致。

2. 党员与党员间，干部与干部间，在正确的原则之下，应和衷共济，和获得更好的互相关系，发扬布尔什维克的阶级友爱。

3. 加强党基本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干部的头脑。

4. 发扬民主精神及正确的执行自我批判。

5. 正确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无原则的纠纷。

6. 从加强政治领导推动积极工作，耐心的说服教育及处处以身作则中去爱护干部、团结干部。

7. 要切实克服：①骄傲自大，不虚心学习；②宗派成见，个人意气用事与片面的观察问题；③对下层漠不关心和声色俱厉的谩骂态度；④背后互相议论、互相诽谤及互相攻击的恶劣倾向，⑤专用感情扰〔笼〕络与无原则的和平共居的倾向。

乙、审查干部的办法：

1. 要从执行上级的决议或指示中去考查，从他的同级及下级的干部中去考查。

2. 要经常的深入的从工作中斗争中去考查。

3. 及时与他讨论政治问题，多与干部个别谈话。

4. 注意干部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关系。

5. 征求他对上级领导与工作的意见。

6. 必要时用审查表去审查。

丙、洗刷政治面目不清的干部：

1. 吸收新党员时，须经过审慎的入党手续，恢复与转移关系时，要按照中央规定的“恢复与转移关系条例”执行。

2. 根据党过去血的经验与教训，向全党同志指出考查干部清洗政治面目不清分子的必要，并教育干部使其明白保卫党工作的重要。

3. 各级党至少要了解下面两级的干部。

4. 要严密党的组织，禁止横的关系。

5. 对政治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分子，在考查时期应撤销他党的工作，分配他到群众工作中去，但始终没有办法考查与证明其来历的，应停止其组织关系。阶级异己分子、暗藏的奸细，应坚决清除出党。

6. 停止关系时，宣告与不宣告的方式如何，要酌情决定。

（七）健全的工作计划，以县为对象应具备什么条件？

1. 要充分了解与把握住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与当地的客观形势，要了解该县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

2. 要明瞭党本身力量，特别要注意同志与干部的数量与质量。

3. 根据上级的指示与决议，配合当地客观形势，抓住中心，具体切实的布置工作。

4. 工作计划不要过于庞大，中心工作决定后，要将次要工作围绕在中心工作的周围。

5. 工作计划要有时间性与阶段性，同时要有具体的执行办法和工作日程。

6. 县委各部门要根据县委工作计划，配合中心任务，定出各部门单独的工作计划。

7.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形，应给以不同的具体指示。

（八）巡视工作怎样才能获得优良的收获？

1. 巡视员事先要充分准备，要与负责同志商谈地方党的一般工作情况，及检查当地党的计划、报告与上级对该地党的决议指示等。

2. 要根据党所给予的中心任务，计划巡视日程与具体内容。

3. 到达巡视地点后，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当地的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

4. 要抓住该地方党最重要最健全与最薄弱的地区或支部去巡视工作。

5. 要参加会议及与负责同志谈话，具体切实的传达上级决议与指示，进行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

6. 要深入下层去检查，要从支部或从县区委去了解实际情形，及党对他们的领导帮助如何。同时对下层的意见与要求，可能解决的及时解决。

7. 检查对上级指示与决议的执行程度和效果，及当地党的工作决定与斗争等，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并必须提出克服办法，帮助切实的布置工作。

8. 要经常与<各别>干部、同志作个别的谈话，了解干部，并加强其教育。

9. 巡视完毕后，要召集负责同志与重要干部举行检讨会议，根据当地党的情形作出具体的指示。

10. 巡视者在日常工作上、生活上、态度上，处处要以身作则，做干部和同志们的模范。

11. 巡视结果，向上级或同级的负责同志提出具体的报告与意见（包括下级对上级的意见）。

（九）什么叫做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怎样才能切实建立？

（甲）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

1. 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与运用。

2. 一切行动方针、策略路线办法与计划以及干部的配置调动等问题，要通过会议来决定，然后依照会议共同决定的原则，由各部委或个别同志分工的负责执行。

3. 集体领导不但能使工作发生更大的效能，而且是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前提。

4. 个人负责制是完成党的任务与各种工作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加强干部对党对革命的负责及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乙）建立的方法：

1. 要从各级委员会的经常按期的集体的会议生活去开始。
2. 要按照工作的需要、干部的特长，去进行适当的分工。

3. 要有经常定期的工作计划，巡视与检查制度。
4. 切实了解自己担任的工作意义与办法，并确定日常工作的日程。
5. 不要笼统的按照地域作报告，要按照各部门单独的做报告。
6. 要切实执行自我批评，克服命令主义与包办现象，以及干部的依赖性。

（十）怎样去切实建立与健全各级党各部委？

1. 大胆提拔适当干部切实的专门负责各部委工作，以充实健全各级党的机构。
2. 各部委要了解执行与完成自己部门的工作任务。
3. 要认真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
4. 要切实建立工作计划与报告巡视的制度，以建立各级党各部委的日常工作。
5. 书记要具体帮助与指导各部委工作。
6. 各部委与下级同部门要有极密切的关系，指导、督促和帮助同部委的下级党去进行工作，但要经过组织关系。
7. 各部委要按期的向党委会负责人及同部门的上级作报告。
8. 健全各级党各部委的组织生活，要按期举行常务会议、执委会议及部务会议。
9. 加强干部的团结，发扬互助互受精神，提高集体的学习。

（十一）怎样才能使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适当的配合与推动？

1. 政治领导是根据当前政治形势，正确的决定党的策略路线、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

2. 组织领导是应当适合政治要求，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所以组织领导是要组织实行路线的斗争，正确的挑选干部人材，很好的审查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的程度，以实现党的总路线方针。

3. 建立各级领导机构，坚强党的基本组织，加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作用。

4. 在组织生活上，要从实际工作的检讨与布置中去加强政治教育。

5. 要在党的策略路线、上级决议及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去切实计划与布置我们的工作。

（十二）怎样提高自信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

甲、加强同志的教育：

1. 提高学习精神，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党的新政策的教育。使他们对政治趋势及社会前途有明确的了解，以加强其对工作的自信心。

2. 使他们能够分析具体环境及每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到一定的行动方针与工作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造成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与精神。

加强实际工作的教育，把各种从工作中得来的经验与教训，以实际例子去教育同志与干部，并使他能灵活运用到工作中来。

乙、工作上的培养：

1. 根据每个同志不同的情形与能力，适当的分配以各种不同的工作，使他在工作中发生兴趣并能确实负起这一工作。

2. 必须帮助他计划与布置工作，并指出工作进行中可能碰到的困难，告诉他克服与避免的方法。

3. 必须经常检讨〔查〕他的工作，发扬其优点与克服缺点，帮助吸收经验与教训，并解决他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问题。

丙、发扬独立工作精神：

1. 克服包办与代替的倾向，发扬信任干部，当工作原则与方针确定后，放手让干部去做的精神。

2. 以各种竞赛与鼓励的方法，以提高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3. 发扬同志的特长，尤其是抓住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加以发扬。

4. 同“左”倾关门主义与右倾悲观失败的情绪作斗争，克服自高自大、风头主义、英雄主义与盲动主义的不良倾向。

（十三）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如何才能取得适当的配合？

甲、怎样划分：

1. 秘密干部与公开干部应有明确的分工（参加公开工作的一般的最好不要参加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干部一般的不应在公开的组织中负责领导工作）。

2. 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应该清楚的划分，不应混同。群众

团体中党团与支部应有严格的划分，不使他们之间有横的关系。

3. 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在领导上与工作方式上也应该有严格的区分。

乙、配合：

1. 从公开组织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从党的组织中去建立与开展公开组织，使能够得到很好的配合。

2. 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必须分别通过党团与支部，并应分别运用党团与支部的核心作用，在各种公开组织中起领导作用。

3. 党的决议要通过群众团体领导机构的决议去进行，克服以党来包办群众团体工作的作风。

4. 在公开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去作工作，推动并通过群众去作工作。

（十四）如何正确的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

1. 先要有政治教育的工作，要使每个同志了解与执行两条战线斗争及自我批评的意义、态度与方法。

2. 反不良倾向斗争与自我批评的原则：

①对于党内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应当把它提到马列主义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高度。

②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为着教育同志，巩固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一致，而不是为着打击同志。

③不能有任何宗派主义的派别成见的立场，及任何个人的意气。

④对同志的错误，要有正确的估计，不应该夸大错误或缩小错误。

⑤应指出其错误的来源、发展前途及克服办法。

⑥思想斗争结束后，应该继续考查其是否在行动上接受批评。

⑦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及自我批评要有经常性。

⑧要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左”倾的斗争中要注意右倾，在反对右倾的斗争中要注意克服“左”倾，并要随时注意两面派、调和主义及和平共居等要不得的倾向。

3. 方式与方法：

①[以]耐心的细心的原则的去分析问题，并以诚恳严肃的坦白的同志的态度去批评。

②要使用讲道理说服教育的方式，并且还要以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错误与不同的人。

③要运用和通过个别谈话、同志的解释说服、少数人的会议批评等方式去进行思想斗争。只有在这些方法无效时，才能展开广大公开的斗争。只有在同志坚持错误不接受批评时，才给以党纪的制裁。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1939年7月下旬）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及在坐〔座〕的全体同志们：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浙江省代表大会，已在中央——东南局正确领导之下，在全体代表一致努力之下，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之下，完满地成功了。在这里，我谨代表全浙〔江〕党，向各代表、各来宾及对拥护大会无限热忱的民众致亲切的敬礼！

大会的成功，第一是表现在它总结了浙江党将近两年来的工作，在里面它不仅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对党的事业，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成绩。

大会的成功，第二是表现在它根据了中央对东南局势正确的估计和指示，配合浙江的实际情形，确定了浙江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和浙江党的工作方针，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完全一致。这种确定，不但使浙江党对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上有了胜利的保证，而且使我们对各友党各友军各阶层及全省二千七百万民众的亲密合作，有了可靠的前提。

大会的成功，第三是表现在全浙[江]党选举了最优秀的干部来参加这一会议，它不仅吸收了经过多年顽强战斗的老干部来参加，而且吸收许多新从群众中涌现出而为群众所信仰所拥护的新干部来参加，使这次大会所决定任务的完成有了确切的保证。

大会的成功，第四是表现在它选出了全浙[江]党员优秀的干部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我们确信，它〔他〕不但能把浙江党的一切情形经验和教训，完满地反映到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去，而且一定能够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一切宝贵的指示和决定，同样完满地带回浙江来。

大会的成功，最后是表现在它选出了新的省委机关。这种选出，使我们如何根据这次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去团结巩固和扩大浙江全党，并且吸收在群众中、在同志中最有信仰的同志到各级领导机关来，健全各级领导机构，去加紧领导抗战，动员保卫正在动荡转变中的大浙江，在领导上有了坚强的保证。

同志们：大会已经胜利的完成了，但布尔什维克党从不骄傲，从不自满，我们一定能够在大会闭幕后，到各处更坚决更顽强的开展工作，继续奋斗到底。

我们要求代表团能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完全反映浙江党整个工作情形，协助七大成功，并带回宝贵的指示和决定的任务。

我们要求全体代表把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完满的传达到各地党里去，深入到支部[中]去，群众中去，使大会的决议成为全浙[江]党一致拥护和一致执行的行动方针，成为保卫浙江、争取民族解放的迫切实现的任务。

我们要求新的省委，在中央——东南局的正确领导之下为彻

底完成这次大会决议而奋斗。

同志们!现在浙江正在动荡和转变中，形势是较前更为复杂了，我们的任务也更为繁重了，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团结全浙一切力量和友党友军及所有民众，手携手肩并肩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我们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斗到底，我们要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到底。我们确信，只要坚决地照着这次大会的方针迈进，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会〕完成的，我们是一定要〔会〕胜利的。



『省一大』选举产生的省委
领导成员名单和代表简介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成员名单

书记：刘 英

常委：薛尚实 汪光焕

委员：龙 跃 张麒麟 郑丹甫 林辉山 刘清扬 顾玉良

候补委员：杨思一 林一心

组织部部长：薛尚实

宣传部部长：汪光焕

统战部部长：刘 英（兼）

统战部副部长：吴 毓

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刘 英（兼）

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郑嘉治

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陈雨笠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名单

代 表：刘 英 汪光焕 龙 跃 张麒麟 顾玉良
郑丹甫 林一心 杨思一 丁魁梅 林辉山
孙绍奎 刘发羨
候补代表：林 尧 谢廷斋 □□□^[1]

[1] 原文缺损或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用“□”表示。下文同。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省委机关：刘 英 薛尚实 汪光焕 吴 毓 丁魁梅
浙南特委：龙 跃 林辉山 郑海啸 陈 平 孙经邃
孙绍奎 刘发羨
宁绍特委：杨思一 王文祥 谢廷斋 魏文彦
台属特委：郑丹甫 周义群 林 尧
金衢特委：林一心 王明扬 何 霖
处属特委：张麒麟 周 源 傅振军
浙西特委：顾玉良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列席人员名单

程为昭 胡景城 陈碧如 陈 辉 杨雅欣
郑竟成 郭道款 郑贤塘 □□□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秘书处工作人员名单

刘清扬 邢子陶 郑嘉顺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简介

刘 英

刘 英（1905—1942），原名刘声沐，江西省瑞金县（今瑞金市）人。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部会计、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师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7月，中央决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率部转战于闽东、闽北、浙西南、浙西和皖南等地。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组建红军挺进师，任政委。1935年3月，与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成立，任省委书记和临时省军区政委，坚持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国民党浙江省地方当局达成了和平协议，在浙江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全省范围内领导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恢复和发展了全省党的组织。1939年7月，在平阳主持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



大会，在会上当选为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还被选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10月，率出席七大的浙江代表团赴延安，在皖南东南局驻地待命期间，因形势逆转，接中央指示，返回浙江坚持斗争。1941年5月任华中局委员，7月任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浙江、福建、江西三地区党的工作。1942年2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同年5月18日，在永康方岩遭国民党杀害。

薛尚实

薛尚实（1902—1977），原名梁昌华^[1]，化名罗根、孔尚士等，广东省梅县人。1926年秋赴上海大学学习，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天津、香港等地工作，曾任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中共南方临时工委书记等职。



抗战爆发后，任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9年4月调浙江工作，同年7月，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参加了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调离浙江。1940年1月后，转入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宣传部负责人、苏中区党委各界抗日联合总会主任、苏北区党委敌工部部长、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1949年5月，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青岛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上海市教育工会主席等职。

[1] 广东、上海等地党史资料记述为：梁华昌。

汪光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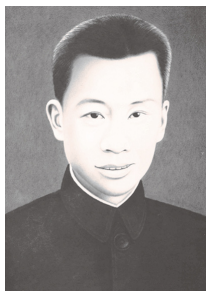
汪光焕（1912—1942），原名汪灼华，又名王易，安徽省宣城县（出生地今属芜湖市）人。1933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上海各界抗日救亡会常务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底调浙江工作。1938年5月，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同月到金衢地区整顿和建立党组织，组建了中共金衢特委，兼特委书记。9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但仍继续留在金华指导金衢特委的工作。1939年7月，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并被选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但因工作需要，没有随浙江代表团赴延安，继续留在浙江工作。1941年四月随刘英去浙南巡视工作。同年7月，被怀疑为“反党分子”，受拘押监管，1942年2月10日在浙南被错杀。1982年平反。

吴 毓

吴 毓（1911—1943），又名吴祖育，浙江省平阳县（出生地今属苍南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负责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组织工作，9月任中共浙南委员会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政治交通。抗战初期，曾作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代表谈判，达成共同抗日协议。1937年9月，受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派，和龙跃一起赴南京，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浙江国共和谈经过及浙南根据地情况。同年10月，任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主任，1938年3月任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成为中共浙江地方组织与国民党浙江当局之间的主要联络人。1939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同年7月，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同年冬，兼任中共永（嘉）瑞（安）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2月，由浙南特委派遣去永嘉西楠溪，代表特委指导瓯（江）北、乐清两县党的工作。12月，在永嘉、仙居交界处被土匪杀害。



丁魁梅

丁魁梅（1916—1986），女，浙江省天台县人。1935年考入浙江大学附设高工染织科，抗战爆发后在家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台县委妇女部部长、台属特委妇女部长、浙江省委机要秘书。1939年7月，作为省委机关代表参加了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但由于怀孕，未能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2年刘英被捕后，从温州辗转至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有关情况。此后，曾任中共华中分局组织科科长、第三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政治组保卫科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干部科科长。1949年随大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副书记、江苏省轻工业局局长。1958年调浙江工作，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浙江省人事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



龙 跃

龙 跃（1912—1995），原名龙兆丰，江西省万载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随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历任红军挺进师政治连政委、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兼（福）鼎平（阳）中心县委书记、浙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1938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委员、省委委员。1939年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但因工作需要，没有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同年1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42年2月省委机关遭破坏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浙南斗争，创建了浙南抗日游击区。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闽浙赣区党（省）委常委、浙南特委书记、浙南地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温州地委书记、浙江省农民协会主任、上海汽轮机厂党委书记、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林辉山

林辉山（1906—1980），原名林上听，浙江省平阳县（出生地今属苍南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福）鼎平（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桐霞县委书记等职。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鼎平县委书记、浙江临时省委委员、浙江省委委员、福鼎县委书记等职。1939年1月，调任中共浙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10月，离开浙江赴延安，1940年底到延安。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工作，任中共辽南地委组织部部长、辽南省第五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9年南下浙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委农工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郑海啸

郑海啸（1900—1987），原名郑志权，曾化名侠山、小觉等，浙江省平阳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北港区农民赤卫队，任队长。1936年开始，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瑞（安）平（阳）县委书记等职。1939年5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常委。同年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了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安全保卫和后勤保障工作，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1940年至1942年，面对妻子、胞弟、女儿三位亲人先后牺牲和家中房屋被烧、祖坟被挖的情况，仍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浙南特委常委、浙南地委常委、浙南行政公署副主席。浙南解放后，任平阳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共温州地委常委。后任温州专员公署专员、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浙江省政协常委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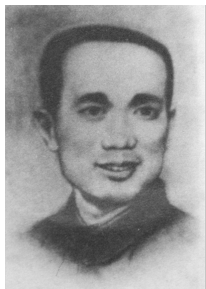
陈 平

陈 平（1915—1995），原名林辉，福建省漳浦县人。1934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在校期间加入共青团，曾任同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到浙江金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任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云和县委书记。1939年5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底在平阳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参与组织赤石暴动，后脱险。曾于八九月间从闽北至云和寻找党组织，后辗转至苏南地区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44年恢复党籍。历任苏南行署财经处生产科长、东北军工部第九办事处工程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和二机部、一机部、三机部基建局副局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基建局局长。



孙经邃

孙经邃（1917—1947），浙江省瑞安县（今瑞安市）人。1935年参与领导温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参加领导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0月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1939年5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同年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任中共永（嘉）瑞（安）中心县委副书记。后任浙南特委秘书、纸山办事处副主任。其间，多次变卖家产，资助革命。1942年冬，受浙南特委指派到四明山，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1945年3月，到乐清召开瓯（江）北、乐清两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浙南特委关于成立瓯北中心县委和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的命令。1947年被错杀。1983年平反。



孙绍奎

孙绍奎（1917—1983），浙江省永嘉县（出生地今属温州市鹿城区）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组织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温州第一个中共学生支部。1938年11月，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1939年2月，任中共浙南特委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6月，任中共浙南特委民运部部长。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10月，随浙江代表团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0年底到延安后，留在陕甘宁边区工作。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在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到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辽宁省本溪市市长、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科委副主任、鞍山市副市长等职。



刘发羨

刘发羨（1915—1995），后改名刘先，浙江省平阳县（出生地今属苍南县）人。1935年参加当地农民赤卫队，1936年参加红军挺进师，坚持浙南游击战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福）鼎平（阳）县委书记。1939年7月，作为浙南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10月随浙江代表团赴延安参加七大。1940年底到达延安后，进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地区参加解放战争，历任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局副局长、黑龙江省铁力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林务局局长、哈尔滨森林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牡丹江专员公署副专员、大兴安岭特委第一副书记兼林管局局长、伊春特区党委第一副书记等职。



杨思一

杨思一（1901—1957），原名杨云亭，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吴兴中心县委委员。1938年2月起，先后任中共诸暨县工委书记、诸暨县委书记、宁绍特委宣传部部长、宁绍特委书记。1939年7月，作为宁绍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



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同年10月随浙江代表团赴延安，但在皖南东南局驻地集中时，因局势逆转，根据中央指示，随刘英回浙江坚持斗争。1940年1月后任中共绍（兴）属特委书记、绍属特派员，领导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成立后，任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会稽地委书记、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浙东行政公署驻会稽地区特派员办公处特派员等职。1945年9月随浙东新四军北撤，先后任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师政委、第三野战军先遣纵队第一支队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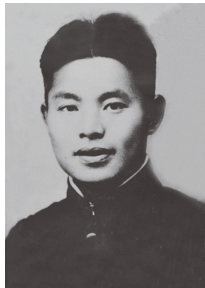
王文祥

王文祥（1906—1945），原名高子清，浙江省绍兴县人。1926年在杭州之江大学就读时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杭州中心市委委员、杭州行动委员会委员等职。1930年被捕，囚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37年12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接上党组织关系。1938年2月，任中共浙江省工委委员，在金华、绍兴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同年5月中共宁绍特委成立后，任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一度代理书记职务。1939年7月，作为宁绍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后任中共宁（波）属特委书记、宁属特派员，在宁属地区组建抗日武装，与南下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的浦东抗日武装建立了联系。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先后任中共四明工委书记、四明地委书记、浙东区党委杭甬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曾受浙东区党委的派遣，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统战工作。1945年9月随浙东新四军北撤。12月在上海病逝。



谢廷斋

谢廷斋（1918—2005），又名肖岗，浙江省余姚县（出生地今属慈溪市）人。1937年参加革命，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长河市党支部书记、余姚县工委干事。1939年5月任中共余姚县委书记。同年7月，作为宁绍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10月随浙江代表团离浙赴延安，1940年12月到达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期间被派往东北工作。东北解放后进军西南，任中共贵阳市委组织部部长、纪委书记等职。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历任第一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第二重型机器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厂长，党委副书记、书记，1979年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机械局局长。



魏文彦

魏文彦（1912—1941），又名王志强，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1939年7月，作为宁绍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至1941年1月，任中共绍属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41年被错杀。1984年平反。



郑丹甫

郑丹甫（1910—1983），原名郑开池，福建省福鼎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任中共瑞（安）平（阳）泰（顺）中心县委书记兼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共浙闽边区党委书记、浙南特委常委。1939年4月，调任中共台属特委书记。同年7月，作为台属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10月从丽水出发准备赴延安，但到皖南东南局所在地后，因时局变化，随刘英回浙江坚持斗争。11月在平阳被捕，后关入上饶集中营。1941年10月，越狱回到浙南，先后任中共浙南特委常委、浙闽边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青（田）景（宁）丽（水）办事处主任、温州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温州军管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水产局局长、福安地委书记、省林业厅厅长、省高级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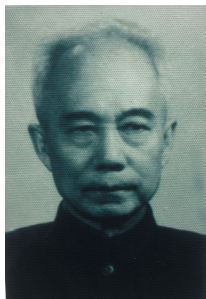
周义群

周义群（生卒年不详），福建省福鼎县人。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任中共浙南特委青年部部长。1939年3月，任中共台属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7月，作为台属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起任中共浙南特委委员、（福）鼎平（阳）县委书记、鼎平中心县委书记，后任省委秘书。1942年2月8日，在温州被捕叛变。



林 尧

林 尧（1912—1987），又名陈成刚，曾用名林保康、杨文通等，浙江省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黄（岩）海（门）工委委员、海门特支书记。1938年5月，任中共临海县委书记，7月任中共台属特委青年部部长。1939年2月后，任中共台属特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部长，主持举办台属青年运动干训班、妇女学习班等，培训党员骨干。同年7月，作为台属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候补代表。1942年在三门被捕。1943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赴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曾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学校教育科科长、鲁迅学院教导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随浙东新四军北撤，任华东党校第三支部书记、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干部队支部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浙江医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浙江教育学院顾问等职。



林一心

林一心（1912—2010），曾用名林多王、林有文等，福建省永春县人。1930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抗战爆发后奉命到浙江丽水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夏秋到金华、衢州等地整顿和发展党组织，曾任中共金衢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金华县工委书记、义乌县委书记，同年12月任中共金衢特委书记。1939年7月，作为金衢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同年10月随团赴延安，1940年12月到达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期间，被派往东北工作，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黑河地委书记等职。后随军南下回到福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职。



王明扬

王明扬（1913—1942），又名王炳康，化名王平，浙江省宁波市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1938年1月调到浙江工作，7月起任中共金衢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兰溪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兰溪、建德、寿昌3县党的工作。1939年7月，作为金衢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后任中共金衢特委代理书记、书记，1940年7月任中共金属特委书记。1941年调省委机关工作。曾任中共浙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浙闽边区办事处主任，领导（福）鼎平（阳）、福鼎、泰顺3县党的工作。1942年4月，在福建省福鼎县牺牲。



何 霖

何 霖（1909—1988），原名胡岩岁，浙江省永康县（今永康市）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交通，回永康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中共永康县工委。1932年10月，任中共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永康中心县委遭破坏后，于1933年3月受上海中央局派遣再次到永康，组建中共永康工委。1935年1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抗战爆发后获释，被派遣回浙江工作。1938年5月，任中共永康县委书记。1939年2月，任中共兰溪中心县委书记。同年7月，作为金衢特委代表参加了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调苏南工作，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财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焦化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党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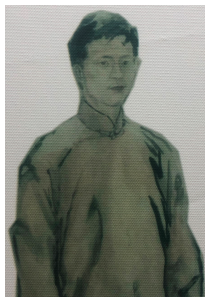
张麒麟

张麒麟（1912—1942），化名张潮，江西省横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浙闽赣皖，任指导员。因在战斗中负伤，留在闽北养伤。1935年随红军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10月，任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书记。同年冬，在遂昌作战中再次负伤，到闽北浦城养伤，任建（瓯）松（溪）政（和）独立营营长兼政委。1937年12月，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培训干部，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恢复党组织。1938年5月起，任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委员、浙江省委委员、处属特委书记。1939年7月，作为处属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同年10月随浙江代表团赴延安，但在皖南东南局驻地接到中央指示，因时局发生变化，随刘英返回浙江坚持斗争。1940年6月，处属特委改为闽浙边委，任书记。1942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遂昌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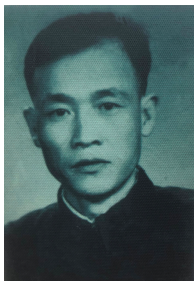
周 源

周 源（1915—1941），浙江省余姚县（今余姚市）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到难民收容所工作。1938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以难民工作委员的名义到浙江做抗日救亡工作。同年5月，任中共处属特委委员、丽水县委书记。以“新知书店”为掩护，多方结识进步人士和知识青年，介绍进步人士入党。1939年7月，作为处属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任中共处属特委组织部部长。1940年6月后，任中共闽浙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龙（泉）云（和）边县委书记，积极开辟龙（泉）丽（水）至浙南的地下交通线。1941年1月，在龙泉牺牲。



傅振军

傅振军（1916—1999），江西省宁都县人。1934年参加红军，同年编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因在战斗中负伤，留在福建游击区养伤，伤愈后参加闽东红军独立师。1935年冬，编入红军挺进师，任师部警卫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奉命随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二纵队重返浙西南，恢复游击根据地。1937年12月，任中共浙西南特委委员，以抗日救亡武装工作团的名义在浙西南开展工作。1938年2月兼任中共龙泉县委书记。1939年7月，作为处属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6月后，任中共青（田）缙（云）丽（水）中心县委书记、处属特委代理书记。1942年浙江省委遭破坏后，失去上级领导，在浙西南地区独立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处属特委书记、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政委、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丽水地委副书记、浙江省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华东纺织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等职。



顾玉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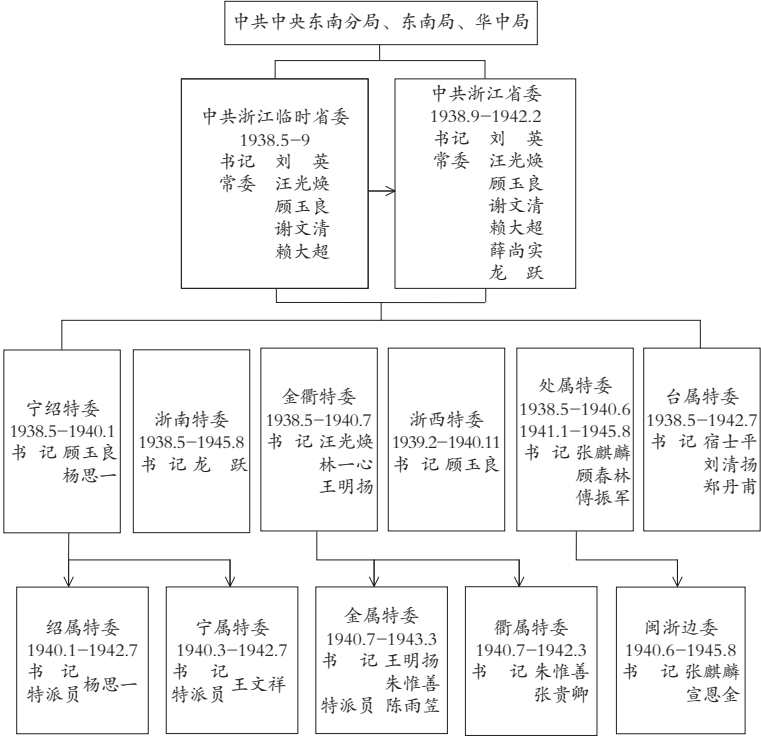
顾玉良（1904—1993），又名顾建业，上海市嘉定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内部交通员、内部交通科科长、中央交通局汕头交通站负责人等职。1933年6月被捕，1937年9月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获释出狱。1938年1月，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遣到浙江工作，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工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宁绍特委书记。1939年2月，受浙江省委派遣，组建浙西特委，任书记。同年7月，作为浙西特委代表参加在平阳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并被选为浙江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但因工作需要，未去延安参加七大。1942年撤往苏南，曾任中共太湖特委委员、淮南路东地委组织部部长。1945年2月任随军工作团团团长，随新四军主力南下浙西，先后任中共安吉县委书记、吴兴县委书记、浙西地委副书记等职。1945年10月随苏浙军区北撤山东解放区，历任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华东党校二部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教育学院院长等职。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
省委组织部沿革表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省委组织沿革表

(1938年5月—1942年2月)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简明读本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开 本 889 × 1194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5.25

印 数 500册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浙内图准字〔2019〕第C017号